**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期4 马克思对社会存在的把握2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1 2019.10.9**

上层建筑要回到经济基础的视野中理解，而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所以对经济基础的理解不可避免地要深入生产关系，而对生产关系的把握也要藉由生产力的视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也不是实体之间的对应关系，而要把生产力作为理解把握生产关系的视野。

首先，什么是生产关系？

按照教科书的定义，非常简单：所谓生产关系，就是生产力各种要素相互结合的社会形式，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和再生产中形成的经济关系，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地位、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形式所构成的。

“人们在物质生产和再生产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叫生产关系”，这个定义看上去是个非常无聊的同语反复。但是，它非常重要：如果把问题变化成“**为什么经济关系在生产和再生产领域中的体现是更为根本性的？**”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

抛开1. **生产关系**来讲，经济关系有两种形态：

2. **交换关系**。

3. **分配关系**。

在我们看来，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交换活动，就是分配活动。好像这两个活动/这两种经济关系也非常重要。但在马克思看来，这两者是次要的，而生产关系是更根本性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讲得非常明确（《全集》卷30）：经济活动有四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生产。马克思认为，交换和分配关系都是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生产关系是更加根本的。

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凭什么？

这个问题的背后还不是生产、交换、分配三种关系哪一个更根本的简单问题，而是有经济思想史的依据的。交换、分配、生产三种关系哪种更加在经济领域中有更根本的地位，对这一命题的认识是人类经济思考达到不同深度的体现。

1. 交换关系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今天的很多经济学家都是按照这个路线来，认为经济学只研究物的配置，不研究关系，更不研究生产关系。研究资源如何分配才能最有效。尤其是从马歇尔从边际效应出发重新论证市场重要性，以及市场关系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性地位开始。

2. 分配关系背后所站着的，是**法国的蒲鲁东和英国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不是李嘉图本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分配领域里面搞革命，讲究平等和公平。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格雷。他们从李嘉图出发——李嘉图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李嘉图派社会主义却把李嘉图的以下结论用于社会主义：所有的价值来源于劳动，即劳动价值论。格雷等人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既然工人创造了价值，工人就应当平等分配价值、分配社会的财富。

为什么生产关系是具有根本性的？这背后，是马克思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蒲鲁东和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交锋。

1. 交换关系，就是市场。亚当·斯密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说，劳动是价值的来源，每一个人都从事劳动。在劳动的基础上，我们肯定不能像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一样一个人生产所有需要的生活物品。你只能生产某一个特定物品。他生产水、你生产衣服，就形成了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工。在此基础上实现交换。（劳动—分工—交换）斯密从劳动价值论的逻辑出发，强调交换的基础性地位，强调“看不见的手”。马克思在《1844手稿》中发现这一理论的巨大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二律背反[[1]](#footnote-1)**，承认**劳动价值论**，但又看到**工人的贫困[[2]](#footnote-2)**。这是斯密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的。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这样一种二律背反，在马克思的《1844手稿》里也解决不了。1844年的马克思，停留在人本主义的思想阶段。他把这样一种二律背反叫做**异化劳动**，认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反人类的、漠视了工人的主体地位——他只能用这样一种思路来理解。然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乃至后来马歇尔的现代经济学所揭示的市场逻辑是社会中不断在重复发生的经济事实，不是人道主义批判就可以解构的。因此，如何理解这种二律背反？它到底是什么？

**劳动价值论 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 工场手工业**

**工人的贫困 劳动者丧失了生产资料 机器化大工业**

马克思后来到《资本论》才彻底解决了斯密的二律背反问题。斯密的劳动—分工—交换的劳动价值论其实建立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关系的前提——**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如何理解？——比方说，我是一个生产矿泉水的小作坊，我也不生产面包，我想买面包就去交换。我占有这样一个作坊，有全部生产资料，是斯密劳动价值论的前提。这其实对应的是**工场手工业**。那么，工人为何会贫困？——因为**劳动者丧失了生产资料**。它对应的是**机器化大工业**。工人对工厂一切机器没有所有权，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就是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对斯密经济学二律背反问题的根本解决。斯密的二律背反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他没有区分这两种生产关系的根本不同，而它们之所以会演变，是因为从工场手工业进入了机器化大工业的阶段。这种生产关系的变化只有在生产领域才能得到体现。斯密的错误在于，他只讲了劳动分工交换的逻辑，但没有看到背后起主导、支配作用的生产关系。这样的一种生产关系的变化背后是生产力的进步。所以，生产力是理解生产关系的一个视野，唯有在这个角度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劳动者是如何丧失自己的生产资料？为什么这种丧失让工人进入了贫困、异化劳动的境地但仍然是先进生产力的标志？下节课继续讨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期5 马克思对社会存在的把握2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2 2019.10.16**

**经济关系：**

**生产关系**

**交换关系 斯密：劳动—分工—交换 🡪 斯密教条：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

**分配关系 蒲鲁东和李嘉图派社会主义**

首先，来看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定义非常简单：人们在物质生产及其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要理解生产关系，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生产关系一定是在物质生产及其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这个问题看上去非常无聊，像同义反复——生产关系就是在生产领域产生的。然而，为什么在生产领域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相比交换和分配关系占据了一个本质/核心/基础性的地位？

许多人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批判是一种无足轻重的批判，或者说是仅仅针对劳动领域的批判，而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生产关系批判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提供了更深层次的维度。

首先，在各种经济活动中，我们首先能看到表层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占据经济生活的表层，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普遍交换的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条件下。从交换关系入手对社会进行批判，是很多思想家展开的层面。例如，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对市民社会的批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市民社会成为了私人利益的战场，我们只能在其中看到一个又一个主观的个人利益，所以是内战、分裂、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状态。然而，在主观利益之间，连接起来的是市场机制，需要的体系，这种东西如果从自在状态上升为自为状态，就需要国家——这是黑格尔市民社会法哲学最关键的。黑格尔不满意的是市场交换关系带来的私人利益分裂，但他诉诸于的，也是一种商品交换的体系。

西方现代社会学开创之初，除了孔德的实证社会学和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以及三大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社会理论家叫**齐美尔**。齐美尔的现代社会批判中，《货币哲学》这本书非常有生命力：他也是从货币出发，也是停留在商品的交换关系，只不过齐美尔更加深入推进：这种货币对我们的文化生活、主观意识、心智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多文学作品也在强调这一点（《欧也妮·葛朗台》）。所有批判，总结起来，“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用金钱关系撕下了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用马克思的话，“把一切浸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

商品交换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种普遍关系。任何商品在马克思看来，有2个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意味着商品的感性存在形式，标志了商品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这瓶水有其使用价值，我需要它，水的功能是商品的独特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商品是具体的、现实的、感性的、独一无二的。然而，商品的交换价值，是抽象劳动构成的、无差别劳动凝结出来的价值，是用来交换的。过去我们之所以从事商品交换是为了获得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但现在我们只是为了获得交换价值，然后去换其他的商品。因此，原来生产是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现在则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一个东西不能交换，无论使用价值如何稀缺，它是没有价值的。这是非常残酷的。

**使用价值—具体——质——多样性**

**价值———抽象——量——同一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使用价值**是**具体的**，那么**价值**就是**抽象的**。原来我们所有交换都是为了获得具体的功能、功用，而现在我们则是为了获得价值——获得交换的能力。以价值为主导的交换中，商品功能变得无足轻重——这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沦为一种**抽象社会**。使用价值是一种**质的规定性**，而价值作为一种抽象只关注**量**。因此今天的社会变成一种**数量化的社会**。因此这个社会奉行**同一性**的逻辑，而非**多样性**。

这个问题，在韦伯处，就是**合理化**——合理化的最大问题就是无聊。尼采猛烈批判布尔乔亚资产阶级，说是“市侩”——它让我们的生命形式萎缩、猥琐。这也是齐美尔货币哲学着眼批判的。

不管是对交换关系进行立论的，斯密以来的政治经济学和后来的现代经济学，还是批判商品交换关系的哲学家、思想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集在商品交换关系上。他们把交换关系无意识地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本质性的存在，要么去解释，要么去批判。因此，交换关系的影响力很大，它不是简单的一种经济关系，而成为了一种**社会原则**——在某种层面上代表了社会批判的一个深度，深入了现代社会。而生产关系则是比交换关系更加深层次的一个批判。

分配关系基本上是当时主流的社会主义者所关注的焦点。蒲鲁东、李嘉图主义者。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追求的是分配正义，需要让人的分配变得更加平等、公正、合理，分配成为了社会主义的一个别称。然而，分配也是经济的一个表层。马克思追求分配正义，但不停留在分配的层面。他追求比分配关系更根本的一种生产关系的批判。

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和英国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流派的影响力并不比马克思来得弱。我们生活在一个马列指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就会想当然觉得马恩科学社会主义是主流社会主义，但其实它并不主流。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力其实远远超过马克思。蒲鲁东这个人巨能写，《蒲鲁东全集》出版到了114卷。他的影响力也很大，今天的很多社会主义都是蒲鲁东的翻版。然而，影响力大，并不代表思想深度就高。今天庸俗的观念比正确的观念在舆论市场上通行得多。

我们希望，把生产关系理解成我们触摸社会现实的一个界面。当我们接触、了解、走进、批判现实社会的时候，要看到，现实社会是有层次的，会由表及里裸露其本质和真相。从交换关系入手，然后深入到分配正义、分配关系，然后深入到生产关系。这是一种社会现实的领会深度。

不要把马克思看成我们这个时代唯一正确的哲学家，也不要把他的视角理解成唯一的视角。除了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批判之外还有其他界面上的批判，不同的思想家用不同的路径去切入同一个社会现象，这些批判视角的多元性的存在，是我们要正视和尊重的现实。然而，每一位思想家从不同的路径、切入点进入社会存在，并不意味着这些视域都是等量齐观的——不要从多元主义陷入相对主义，不能说“每一种路径都是对的，没有高下之分。”相对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糟糕的哲学。相对主义意味着虚无主义：怎么都对、每一种价值都有其存在合理性，应当同等对待，不应该分出高下。因此今天的时代在借多元主义标榜相对主义，相对主义在时代的实践中已经遭遇了极大的问题。例如在美国，不同族群、文化、生活方式是否都具有合理性，这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如果一旦如此，那么美国基督教传统对家庭、道德的坚持就会荡然无存。在欧洲，多元文化主义兴盛，但这种多元主义最后变成隔离主义，允许少数文化的存在，但使之缺乏对话能力和融合能力，而越发激进化。最可怕的是虚无主义：让我们这个时代再没有高贵卑贱之分，价值等级荡然无存。[[3]](#footnote-3)

我们今天着重要讲，为何最为本质性的经济关系一定植根物质生产和再生产领域，而非商品流通和分配的领域——这使马克思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思想家。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哪？要从其思想独特性和深度来挖掘，而非泛泛就其追求人的解放、社会平等而言。

为何交换关系不像生产关系一样达到本质维度？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也是从交换关系入手，直到《资本论》才深入生产关系。黑格尔、齐美尔等思想家，都是在亚当斯密关于交换关系的典型学说/理论模型之上加以批判。

亚当斯密也有其劳动价值论：劳动的过程中，每个人只能干一件专业的、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其中就必然发生分工——分工使劳动效率可以极大提升，使得生产不断专业化、精细化、细分下去。然而，斯密所说的“不断细分”，不仅标志劳动的精细化、分离化、分散化，也标志着劳动的**社会化**——不同的劳动分工之间要依靠交换连接在一起。分工越发达，对于市场的依赖性就越强；生产越分散，越需要市场交换关系来整合。没有人能独立在市场交换关系之外。这种意义上，生产是具有社会性的。社会的联系靠市场、交换。

斯密的论说，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路很像——从物质生产开始，然后讲分工。分工不仅标志生产力进步，也标志生产关系发达。分工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分工带来**交往形式**（生产关系这个词在《形态》很少出现）。《形态》的经济学，深刻性远远达不到《资本论》的水平。

斯密把交换关系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市场机制是主导机制。交换关系的普遍化就产生了马克思所说的“**斯密教条**”，即工人用劳动换取工资，资本家用资本换取利润，地主用土地换取地租。这就是斯密所处年代的三大阶级。

斯密之后，李嘉图把资本家和地主阶级合并在一起——地主容易带来封建社会的复辟，因此李嘉图要把土地资本化、农业生产资本主义化。资本是物，可以换取利润，而土地也是一种物，地租和利润也在内容上无区别。因此李嘉图是要把原来的地主也变成资本家，主张资本家把土地变成资本。英国的资本主义，从三个阶级变成两个阶级，就变得更加纯粹。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按照这样一种斯密教条——劳动换取工资、资本换取利润，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天经地义等价交换，构成了今天时代的日常意识形态。[[4]](#footnote-4)

按照这样一种理论，那么资本主义是太和谐了。论证资本主义和谐最重要的著作是**曼德尔《蜜蜂的寓言》**：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浸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里面，人人都在为自己，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但是在不知不觉中由于分工交换的体系的存在而满足他人的需要，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人人为自己，社会大和谐。蜜蜂的寓言，就是自私自利创造资本主义大和谐。

交换关系层面所做的论述，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前提。马克思的贡献则在于指出这样一种交换并不等价。交换关系是否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逻辑？马克思对此予以否认。

在**《1857—58经济学手稿》**（蓝皮马恩全集第二版30—31卷，在西方影响很大，又名“政治经济学大纲”）中，马克思说：“**商品世界通过它自身便超出自身的范围，显示出表现为生产关系的经济关系。**”

这句话很重要。为什么会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要看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的一个独特论证。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实际上是先分析商品，通过商品的分析进入货币的分析，然后通过货币的分析进入资本的分析。**商品、货币、资本**分别代表了资本主义浅层到深层的三个深度。

马克思在对商品的分析中指出，商品有2种价值：**使用价值和价值**。使用价值由具体劳动构成，价值由抽象劳动构成。商品的使用价值之间本身是无法直接进行交换，但这种无法交换性其实构成了交换的前提。慢慢地，货币从商品维度中脱离出来，使用价值越来越抽象，最后成为价值的一种显现。

出现货币之后，社会的经济关系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以商品/货币为主导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马克思说，要区分两个过程：

**商品—货币—商品 为买而卖 需要 等价交换**

**货币—商品—货币 为卖而买 欲望 非等价交换**

1. **商品—货币—商品**。拥有商品，用商品换取货币，用货币换取其他的商品。这是简单的商品流通，物物交换。在这个过程中，货币仅仅是一种媒介，并不重要。我拥有某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它正好为他人所需要，而他人有我需要的商品使用价值。这个交换过程中，起点和终点都是商品，都是为了获得一定的使用价值。这是一种**以商品为主的货币交换**。其实，它就对应斯密所讲的分工的交换逻辑。我只生产水，不生产衣服，所以必须得交换——我的水换取货币为了买衣服，从使用价值回到使用价值，的确构成了一个黑格尔所说的**需要的体系**。

2. **货币—商品—货币**。然而，今天我们的社会不是如此，而是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货币不是媒介而成为了主体（参见齐美尔）。以货币为起点，通过货币换得一定的商品，赚取更多的货币。今天的金融、投机都在于此。现在有点闲钱的家庭，都理财，通过货币的运作实现货币的增值。

1和2看似没有什么区别，但它们实质上区别很大——从一种简单的商品经济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1仅仅是商品使用价值的交换，用马克思的话说，**为买而卖**；2则是**为卖而买**。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再被需要，我只是为了把它卖出去，以获得更多货币。

从斯密教条来讲，这就是“资本—利润”的交换，投入资本进去，收获更多的钱。

在1中，是**等价交换**，起到主导作用的是**需要**。然而，在2中，则是**非等价的交换**，有增值，钱能生钱。因此，在2中，其动力并不来源于需要，而是来源于**欲望**。商品进去商品出来是无话可说的等价交换，而货币进去货币出来，产生了增值，这个增值Δ*m*，马克思就叫**剩余价值**。这个价值的增值过程，是**无法在流通领域中得到说明的**——流通不是价值的来源，因为在流通领域层面，货币A—商品和商品—货币B都是等价交换。这个无法在交换领域说明的，只能诉诸生产领域。

马克思说，构成这个交换中介的商品，是一个**特殊的商品**——能够出现增值的商品。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无差别抽象劳动决定的。生产水杯4个小时工时，价值量就是4个小时。生产所耗费的时间没有增长，价值就没有增长。这是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我把其中4小时人类无差别劳动的量标定为10元卖掉，卖出的价值还是10元。因此，物的商品是无法带来增值的，顶多就只有价格的波动（要区分价值和价格）。只有一种特殊的商品，即被商品化了的**人**，即**劳动力商品**，才能增值。劳动力商品与物不同，它虽然也是商品，也一定有其使用价值和价值——劳动力的价值是为了获得劳动技能所耗费的时间（这用工资表征），和其他商品无甚区别；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则是其独特的地方——它能够创造价值使得价值增值。劳动力商品和一般的物，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它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在这个层面上，马克思又回到了劳动价值论：价值，包括剩余价值（增加的价值），只能通过劳动力产生。劳动创造价值。剩余价值只能来源于劳动力商品——来源于商品的生产过程，而不能来源于商品的流通过程。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是它能够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

如此一来，马克思就在劳动力商品的层面解释清楚了斯密教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对斯密教条概括为“资本—增值”，这里所谓资本就是资本家提供的各种生产资料，无论如何都是物，物进去价值增值出来。但是，物不会自己创造价值，所以价值只能来源于劳动。换句话说，在马克思处，准确的图示是：

劳动[力]（创造了价值，包括剩余价值）

劳动力商品的成本—工资

劳动力商品的剩余价值Δ*m*—资本家的利润和地租

这是对斯密教条的根本改写。利润和地租，都是剩余价值的再分配，是劳动带来的，而不是物带来的。工资也不是对应劳动的全部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交换——劳动获得工资、资本获得利润，就是非等价的交换。真正等价的交换，是劳动把工资利润地租全部拿走。资本家只提供了物，物本身不能增值。

马克思不是说“工人要拿走所有东西”，而是要通过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来论证斯密劳动教条并不是等价交换。剩余价值被资本家窃取，这就叫**剥削**。工人好像生活在一个劳动创造价值的平等社会，而马克思要揭示出其中的不平等性。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发现，交换关系的维度是不够的，流通领域无法揭示价值增值。要揭示价值增值的秘密，只有进入生产领域，只有分析劳动力的商品化。

劳动力的商品化意味着什么？

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价值不断增值的逻辑。这个增值的逻辑，是无法在流通领域得到揭示的，也就是，没有办法在交换场所进行解释，只有在生产的场所——劳动力的商品化。所以，马克思根本上瓦解了斯密教条。

然而，这样还没有达到生产关系的实质。凭什么劳动力的商品化就是商品世界通过其自身并超出其范围显示出生产关系的经济关系？**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也就是交换的过程，为什么会显示出生产关系**？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内容。

劳动力商品化的前提是什么？或者说，劳动力商品何以是一种生产关系？劳动力之所以商品化，说白了，就是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商品。马克思在此区分了劳动者和劳动者所具有的能力，劳动力不等于劳动。

**劳动力商品**

**前提：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

**效应：商品交换的普遍化**

劳动的商品化——劳动者愿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5]](#footnote-5) 卖是一个被迫的过程，我们之所以愿意卖劳动力，其**前提性的条件是，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分离，才出现了劳动力的商品化。

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性特征。

所谓**生产关系**，其完整定义包括3句话：

1. 是生产力诸要素受结合的社会形式。

2. 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和再生产中形成的经济关系。

3. 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由以上两个关系形成的分配关系即生产关系的三要素。

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分离，劳动者不再占有生产资料，这就是一种生产关系。

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关系：不是等价交换，而是支配和被支配、剥削和被剥削。

分配形式：斯密教条的瓦解，剩余价值。

所有的生产关系要素最终都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占据了生产关系的核心，它起到主导作用。劳动力商品化表面上是在商品交换，但前提是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所决定的。

马克思只是讲了在生产关系的领域能够看到劳动力的商品化、解释价值的增值过程，看到交换关系所看不到的东西（你在交换关系中看到等价交换，我在生产关系中看到剥削与支配）。然而，你怎么证明你所看到的是更加有深度的一重关系？[[6]](#footnote-6)

在此，马克思就进一步深入解释。马克思说，劳动力的商品化，其效应是**商品交换的普遍化**。

斯密从交换关系入手，把交换关系视为经济关系中的核心，而其之所以成为核心地位，就是因为商品经济的普遍化，我们今天生活在普遍交换的时代。斯密教条也好，交换关系的界面也好，都是建立在交换关系普遍化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交换关系如何普遍化？我们知道，交换关系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普遍化的。对此，法国人类学家，比如**莫斯**，就提出**礼物经济学**。他通过研究人类早期经济活动，发现更多是馈赠的关系，而非交换。商品的交换的普遍化，不是人类一有了商品就开始的。这中间经历了很长的过程。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力商品化之后，商品交换才会普遍化。

马克思说：**因为劳动能力本身还没有交换以前，生产的基础还不是建立在交换上的。交换只限于以不交换为基础的狭小范围内，资产阶级生产之前的各阶段的情形便是这样。**（ME31/p.69）

“交换以不交换为基础”如何理解？

**劳动价值论—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工场手工业**

**异化劳动——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机器大工业**

按照斯密的逻辑，**劳动—分工—交换**，讲的还不是交换关系的普遍化。例如，我生产水，别人生产衣服，我们就要交换，使得生产水的人获得衣服。问题在于，生产水是如何生产的？——我有一套设备，可以把山泉水加工成矿泉水灌进瓶子里。那么，这套用来生产矿泉水的设备（这些生产资料）还是生产水的劳动者所有的。因此，斯密的分工交换的劳动价值论建立在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在这样一个前提下，生产水、卖出水为了换货币，换货币是为了换衣服，因此停留在物物交换的阶段。这是商品经济的初级阶段、简单形式。

而商品交换的普遍化，则是不仅要求劳动产品需要交换，你的劳动条件、生产资料也需要交换。因此它必须以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为基础。[[7]](#footnote-7) 例如，修理衣服的小工不会把缝纫机也拿来交换，所以这个阶段上只是产品交换，而不是生产资料交换，因此这样一种交换是以生产资料的不交换为基础的。生产资料要交换，只能依赖劳动力的商品化。如果劳动力没有商品化之前，就是物物交换，而只有当人出来卖的时候，所有一切才都可以交换，即“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共产党宣言》语）。小业主自己用双手创造的美好生活，那些坚固的生产资料不会烟消云散。只有人也出来作为劳动力卖，才意味着这个世界不再出现不可交换的东西，因此必然进入一个以货币为主导的高级交换形态。过去货币是媒介用以交换商品，现在货币则是主体统摄一切商品。这个货币，就是资本的货币化的形式。只有进入这个层面，一切都用货币来衡量、由货币来主宰，才是商品经济的完成形态，才是商品交换的普遍化形态。

只要在资本的驱动、货币关系的支配下，才能完成劳动的商品化和商品交换的普遍化。在这种情势下，小业主要么兼并成为资本家，要么被收购成为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

我们的人格、良心、知识、社会地位、声望、人脉等，在古典时代是不能用来交换的。然而，在货币主导的社会中，它们都可以拿来卖——这就是商品交换的普遍化的后果。

生产关系发展到资本主义的阶段必然会出现商品交换的普遍化、交换关系的全面化。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论证了斯密教条中交换关系的全面支配地位一定建立在资本主义大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的，所以是生产关系决定交换关系，而非交换关系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交换关系的逻辑深层。

至此，我们也就论证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即生产关系为什么比交换关系更加根本/本质性。它不仅可以看到交换关系这一层面看不到的东西，而且可以论证交换关系何以普遍化。它是交换关系普遍化的前提性条件。因此生产关系是交换关系的主人。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反复强调，劳动力的商品化、商品交换的普遍化、劳动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都是在社会化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展开的。亚当斯密有其道理，但只是在工场手工业阶段才是真理。

在《1844手稿》中，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被马克思抛弃和否定：如果按照劳动价值论，为什么工人越来越贫困？——当时的马克思认为劳动价值论完全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然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劳动力商品，似乎还是回到了劳动价值论。——这个思想转变，其实是因为他意识到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以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而劳动价值论的失效则是因为劳动者丧失了生产资料——这两种生产关系完全不同，因此对经济活动的解释也必然是不同的。如果我们在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前提下讨论，那么斯密所讲的是对的；但现实是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因此“昨天的船票登不上今天的客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是盲区，没有区分劳动者占有/丧失生产资料的情况，因此认为斯密教条是永恒的。

那么我们需要追问的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从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和谐时期一定会发展到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的阶段？

另一个问题是：马克思最后是不是要回到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状态？

因此要区分：斯密所构想的社会中，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是一种**私人占有**；马克思批判私有制，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不是私人层面的占有，而是**社会公共占有**。私人占有是小生产状态，是工场手工业的状况。而从私人占有到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的过程之所以是必然的，是因为其建立在生产力的维度上，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工场手工业必然要进入机器大工业。关于这一点可以重温《形态》对大工业不可避免的叙述。

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背后不仅存在生产关系的盲区，同时也存在生产力的盲区——斯密的所有合理性都是停留在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力阶段而言。进入机器大工业，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是必然发生的。

**劳动价值论—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工场手工业——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

**异化劳动——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机器大工业——劳动对资本的实质从属**

那么，为什么从工场手工业进入机器大工业必然会让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必然出现异化劳动，而不是劳动者获得价值？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证：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劳动对资本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从属关系**，劳动可以在资本的形式中随时随地抽身出来。而机器大工业中，劳动则是**实质从属**于资本，开弓没有回头箭，因为**人和生产资料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颠倒**。在工场手工业阶段，人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在机器大工业阶段，劳动者是劳动资料的奴隶。

比较：1. 开饭店，我作为厨师卖给老板，这个劳动对资本的从属是形式的，我是案板的主人，我有手艺。这是工场手工业。2. 饭店变成麦当劳连锁，有中央厨房流水线和统一原料加工运输配送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再也不是运用锅碗瓢盆的主人，而是机器体系中的一颗螺丝钉。

机器大工业使得人和机器（生产资料）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颠倒。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有**手的神秘性**，而机器大工业取消了手的神秘性。厨师的手的神秘性体现在油温到底是七成热还是八成热、什么时候断生，有这样一种神秘性，一招鲜吃遍天。然而，在麦当劳里，谁还需要你的手艺？换个人都能干，所以取消了手的神秘性。因此，所有的劳动者对于机器来说都只是其零件而已。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所以劳动对资本的从属是一种实质性的从属，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一种更加彻底的分离。

所以，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必然出现生产关系的这样一种深刻变革。之所以对生产关系的透视一定要进入生产力的领域，否则无法看清楚生产关系的实质性——它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出场、它的历史规定性是什么。落脚点一定要放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上。

下一阶段讨论文本：蓝皮马恩全集第二版30卷《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这个文本讲为什么劳动者会与劳动资料分离，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何以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期6 马克思对社会存在的把握2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3 2019.10.23**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之前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但是，它是一个真正能标志马克思思想深度的问题。讲来讲去，只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生产关系是所有经济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对于社会主义的批判/建构，为什么生产领域是一个最根本的领域？为什么生产力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上周所讲：交换关系和生产关系。从交换关系出发，无论是建构，还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都没有把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性维度，即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资本和劳动的非等价交换。更重要的是，生产关系决定了交换关系。从交换关系的内在矛盾中，我们可以发现，劳动力的商品化带来了商品交换的普遍化。

本周我们讲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联。如果说“交换关系”的维度可以看出马克思和其他资本社会批判的区别，那么从“分配关系”的维度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何种社会主义。

对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而言，社会主义就等于平均分配、平等。马克思也追求平等，但是发现要想真正实现平等，不能停留在分配领域，必须深入生产领域。

停留在分配领域的社会主义有2个代表：**英国李嘉图派社会主义和法国蒲鲁东主义**。

**A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

英国李嘉图派社会主义是从李嘉图的理论前提上加以改写得来的。李嘉图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继斯密之后又一个代表性人物。他倡导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包括交换价值和价值）是由一定的人类劳动的量构成的。由此出发，李嘉图建构起一个政治经济学的体系。这个体系显然是要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这个过程中李嘉图就出现一个矛盾：劳动价值论和资本收益论的矛盾。

在斯密处，有工人、资本家、地主三个阶层。李嘉图要把地主取消掉。之所以他强调劳动价值论，是因为他认为，地主拥有土地，但是不劳而获，应该被取消。李嘉图要把斯密的三大阶层简化成劳动、资本两大阶层。

资本获得利润，就和劳动价值论有显著冲突：如果价值是劳动创造的，那么资本为什么能获得利润？——这就推动了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的产生：他们反对资本收益论，提倡劳动价值论，希望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构建社会主义。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是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也讲劳动价值论，但他的社会主义基础不是劳动价值论，至少不是英国古典经济学意义的，而是双重劳动创造双重价值。此外，马克思的经济学基础不是劳动价值论，而是剩余价值论。）既然工人的劳动创造了所有价值，那么全社会的价值就应该在工人中平等分配。这是李嘉图派的逻辑。

那么，李嘉图派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要探讨**格雷、汤普逊和霍奇金斯**三个人。他们都从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出发，希望获得平等分配。然而，论证思路不一样。格雷更强调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汤普逊更强调功利主义，而霍奇金斯是从自然法的原则论证。

1. 先看**格雷**。格雷的代表作是《**人类幸福论**》。在其中，他提出了一个观点：(1) **劳动是财产的唯一基础**。

这个观点和劳动价值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格雷在此基础上说，(2) **任何财产都不外是积累的劳动**。这句话非常关键，也是从前一句话 (1) 推演出来的。意思是说，资本家的资产都是工人以往劳动产品的总和。

这个在逻辑上虽然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格雷认为，**劳资交换**（劳动和资本的交换）实际上是**工人当下的活劳动**和**积累的劳动**（过去劳动产品总和，死劳动）的交换。用积累的劳动控制当下工人的活劳动，两者交换，必然是不平等的。因为，当下的活劳动被源源不断进入积累的劳动，积累的劳动越来越多，但当下劳动换得的工资一成不变。

因此，格雷说：劳动和资本的每一次交换都是不平等的交换，都伴随资本家用积累的劳动对当下活劳动的剥削，因此必然的结果就是**多占有工人的劳动成果**，从而必然出现**贫困**。

这是格雷整个理论的推演过程。格雷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看上去顺理成章。然而，当格雷把资本理解成积累的劳动（工人以往劳动产品的堆积）时，他其实是把资本理解成一种**物**。然而，马克思一直强调，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

格雷的问题在于，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交换被格雷解释成了一种物物交换，即商品和商品之间的交换。格雷对于分配的这种讨论表面上看在分配关系上做文章，但实际上立论的基础还是在物物交换关系上，仍然是在交换领域。根本原因是格雷把“资本”固化了，把工人的劳动和资本家的资本之间的交换变成了物物交换。格雷没有进入生产关系的维度，所以就不会知道，资本生产关系本身就已经在物物交换关系之前决定了剥削的存在。

应当把资本看成一种劳动的条件、劳动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

这背后有其哲学的深度：对于资本怎么理解？

格雷之所以把资本理解成一种积累的劳动，是因为两种哲学观念：**经验主义和人本主义**。

(1) **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强调感性直观。所能经验到、在感官中认识到的资本是厂房、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所以资本是以物的形象出现的。所以，我们用直观的方式就很自然地能把资本界定为物。这种方法也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方法。资本家拿出土地厂房机器设备，当然应该获得收益（按生产资料/生产要素参与分配）。

(2) **人本主义**

这是格雷区别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地方。格雷之所以认为资本是积累的劳动，其实是因为，人本主义认为，存在物一定是对象性的存在者。“我”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依托对象存在。《1844手稿》中马克思停留在人本主义阶段，他在其中讲，劳动是确立人的本质的一种活动。人的本质体现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也就是劳动。劳动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体现了人对物的加工、能动性的改造。

按照人本主义的观点，劳动创造一切，甚至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当然也就是资本的来源。资本是由劳动所创造出来的。

马克思在《1844手稿》中，也是把资本理解成积累的劳动（劳动的产物）。这种观点，事实上也是把资本物化了。

当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关系”的时候，我们用形质论的角度可以这样理解：物是质料，不是对资本的决定性的规定。我们说资本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就是说它是一种**社会形式**，可以吸纳各种物质质料。资本作为生产关系、社会形式是无法通过感官经验的直观来把握的。因此，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也是马克思的经验主义批判、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2. **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格雷和汤普逊都讲“幸福”，就是因为他们要批判资产阶级当时的庸俗经济学。庸俗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只研究财富的生产问题、效率问题，研究如何以最低产出获得最大回报，而不关心人类的幸福。因此这批社会主义者觉得“怎么可以不关心人类的幸福呢？财富应当是增进幸福的，幸福应当是财富的归宿和目标！”因此，他们也有人本主义的倾向。

现在很多人从人本主义对经济学展开的批判，也是这条路线，认为经济学只讲效率不讲幸福。逼得搞出一个不伦不类的“幸福经济学”。幸福是主观体验，无法通过经济学来研究。然而，当时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财富和幸福有必然的联系，为了幸福要研究财富的分配原则。

汤普逊说，我们研究财富的分配，和研究如何通过劳动使得财富增长，目的是统一的，都是为了促进社会的最大量的幸福。由此出发，汤普逊就发现：一方面强调**生产最大化**（这也是庸俗经济学最关心的问题），另一方面生产的最大化不会自动带来**幸福最大化**。在汤普逊看来，幸福最大化，就是**平等享用的最大化[[8]](#footnote-8)**。

这两者会发生**矛盾**：有的时候为了生产最大化恰恰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幸福，不平等恰恰能够使得生产最大化。这也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很大的矛盾。

由此现代经济学出现了**帕累托效应**这一原理：社会的经济增长一定要使得社会绝大多数人普遍受益，但普遍受益并不等于平等受益。财富增加之后，有些人可以多拿一点财富，有些人可以少拿一点财富，但总之都拿到了财富，你吃肉我喝汤。如果汤喝不到经济增长就难以为继。因此，帕累托效应还是讲，“可以牺牲平等，把蛋糕做大，分配应该按促进生产最大化的原则来进行，但必须保证社会所有人普遍受益。”最理想的情况是有人吃肉有人喝汤。

在改开初期，我们就强调帕累托效应。“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关于分配原则的口号蛮有意思：好像创造了一种假象，效率和公平好像出现了矛盾？——然而，从哲学的角度，这很荒谬，高效的反面不是公平，公平的反面不是高效。

包括美国政治学家**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的兴衰》等）：他认为，之所以有的国家发展得好，是因为这种国家是共享型政府，可以带来帕累托效应；有的国家发展得不好，是因为这种国家是攫取型政府。

此外，法国社会学家阿兰·佩雷菲特《信任社会》分析了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发现前者往往高于后者（如意大利）。卢卡奇（亚圣[[9]](#footnote-9)）、科尔施、葛兰西是西马三巨头。要理解葛兰西，就要理解意大利南北经济的巨大差别。葛兰西的革命策略就是从之出发的。《信任社会》探讨为何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他发现，天主教强调教会、牧师的作用，而不信任信众。要想和上帝建立联系，必须通过牧师、教会。这样一种结构，就使得天主教很容易产生腐败[[10]](#footnote-10)（马丁·路德之所以发起新教改革运动）。这两种机制带来的效果：新教国家的社会关系很容易进行横向拓展，可以扩散化、均质化、扁平化。然而，天主教国家因为强调教会、牧师，就只能是垂直型，很难在横向上扩散，造成交易成本高、信任成本高。因此，新教国家带来共享型的信任社会，而天主教国家则不能如此。

汤普逊认为，生产最大化和幸福最大化的矛盾，是根源于分配领域的问题。因此，汤普逊说，我们应当根据劳动价值论来进行平等分配。因此，他的社会主义方案，就有**三个原则**：**自由劳动、完全享用自己的劳动产品、自由交换**。汤普逊依据的理论原则很简单：没有劳动就没有财富，既然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那么劳动应当成为财富分配的唯一原则。

听到这里，我们就会想到一个问题：格雷、汤普逊都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出发，分配关系也进入到生产关系、劳动领域，那么，为什么说他们达不到马克思的高度？

——这里就涉及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劳动**，是什么意义上的劳动？

汤普逊的问题也是出在这里。简单来分类的话，可以分出三种完全不同的劳动，由此产生三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方案：

**李嘉图 交换价值**

**汤普逊 使用价值**

**马克思 物质生产过程＋价值增殖过程**

1. **李嘉图**劳动价值论所讲的劳动：是商品交换条件下的劳动。因为生产某种商品需要的劳动量构成了商品的价值。李嘉图关心的是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是用来卖的劳动。

2. **汤普逊**表面上从李嘉图出发，但当他说“没有劳动就没有财富”，他所指的劳动就和李嘉图不同了。如果说李嘉图的劳动是创造交换价值，那么汤普逊的劳动就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也就是马克思后来所讲的具体劳动[[11]](#footnote-11)。

汤普逊认为财富和交换价值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就是根据使用价值决定的。有些东西不能在市场上交换，但也是财富，比如生态环境（干净的空气、阳光和水）。财富和交换价值没有必然的联系，带来一个问题：汤普逊的自由交换是直接的物物交换，不经由货币。一旦通过货币，用以衡量的就是交换价值，取消货币，物物就直接交换。这在原始社会中是非常常见的。汤普逊认为，理想的劳动应当是满足使用价值的劳动，理想的交换也应当是满足实用价值的，不应该通过货币。所以他就取消了流通领域。然而，交换不可避免，不用货币衡量，就只能用“劳动小时券”，或者用我们过去的话，叫“工分”。马克思说，这是很愚蠢的。取消了人民币，没有取消货币，换汤不换药而已。因此，这是汤普逊的问题。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汤普逊这样的一种劳动仅仅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是理想化了的劳动。对于这样的劳动，马克思有一个评价，可以概括为“想象很美好，现实很反动”。完全能够享用自己劳动产品的劳动，是自给自足的劳动，在现实生活中叫小生产。小生产相比机器大工业是落后的生产方式，现实上是反动的，不适应现代生产力的要求。

此外，它是一种理想化的劳动，还因为在这种劳动中，是贯彻了人本主义的劳动观，认为劳动是对象性的。在劳动这一对象性活动中，人和物是它的两端。人通过物的存在（物对于人是对象性的存在）来证明自己的现实性、证明自己的本质。这种人本主义的劳动观中，人只和物发生关系，而不和人发生关系，因此就是最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对物有绝对的支配地位。然而，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劳动非常痛苦，不是因为人和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人和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作祟。

因此，汤普逊的使用价值的劳动，只考虑人和物之间的关系。因为有这一重关系，物对劳动者而言就是有使用价值的。然而，如果考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涉及物对他人的价值，就会涉及交换价值、生产关系的问题。

汤普逊这种以使用价值为目标的劳动，想要替换以交换价值为目标的劳动。因此，其实是一种陷入孤立状态的、没有社会化的劳动。很形象的比喻，就是农民伯伯春种秋收、自给自足，向土地索取他所有的生活资料，不需要和社会发生广泛的联系。因此马克思在这个意义上说，汤普逊的这种劳动比李嘉图的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劳动更加倒退。李嘉图虽然是片面的，但是建立在广泛的社会联系上；汤普逊看上去是理想的，但实际上是反社会的。

3. **马克思**所讲的劳动，在《1844年手稿》中和汤普逊是一样的。然而，到了《形态》和《资本论》的时候，马克思就不同了：他说，所有劳动都是现实活动，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下的活动。劳动的现实性就在于，它一定是在一定社会形式下的劳动。

《资本论》中，马克思说，劳动可以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物质生产过程**，另一个是**价值增殖过程**。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就是这两个过程的合一。

汤普逊所说的，以满足使用价值为目标的劳动，是一种理想化的、反社会的劳动，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抽象劳动**，而不是现实的劳动。现实劳动一定是在社会形式下、生产关系中的劳动。马克思区分物质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其中，价值增殖过程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有剩余价值生产出来，就是因为有劳动力的商品化，劳动力的商品化意味着生产关系的维度进入分析了。

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我们只能看到物质形态的改变，而看不到生产关系的维度。因此，这两个过程的区分虽然只能是理论上的，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并且会带来一系列的反映。资本主义劳动的过程是物质生产和价值增殖过程合二为一。

**物质生产过程—对象化—人/物的关系—自主、支配—一般—超历史—质料（被决定）**

**价值增殖过程—异化——人/人的关系—被支配———特殊—历史的—形式（决定）**

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对象化**，而在价值增殖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异化**。对象化的劳动中，我们只能看到**人和物的关系**；价值增殖过程中我们能看到**人和人的关系**。对象化的劳动中，我们看到的是**自主活动、人对物的支配性活动**；而增殖过程中则是**被支配**。物质生产过程是一个**一般化的过程**，而价值增殖过程中显现出一种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赋予了物质生产关系一定的历史规定性、社会条件规定性，因此是**特殊**的。不同社会条件的劳动，物质生产过程中是一样的，但生产关系是不同的。进一步推演下去，就会发现，物质生产过程是**超历史的**，而价值增殖过程是**历史的**，在历史中生活，最后也会在历史中被代替。

物质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这一系列的推演。只有区分这两个过程，马克思才能从劳动中发现生产关系。否则，抽象劳动的层面只能看到人和物、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关系，而看不到人和人、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是很难分清楚的。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而言，物质生产过程是**质料**，是所有社会条件下都要满足的；而价值增殖过程是**形式**。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就是由价值增殖过程中体现出的生产关系来支配、主宰物质资料。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是形式吸纳质料、形式决定内容。

这是非常深刻的。当我们一般的唯物主义者批评唯心主义者的时候，会说“质料决定形式”，但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天然具有唯心主义特征，是形式决定质料。资本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某种内在联系就在于此。因此，马克思所讲的劳动分析，不仅是一种社会批判，也是一种深刻的哲学批判，或者说形而上学批判。

马克思所讲的现实劳动，具体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就是以物质生产过程为物质载体，以价值增殖过程为物质形式的劳动。二者的结合是质料和形式的结合。质料的层面是看不出历史的，因为所有物质条件下的劳动都是生产过程；然而，只有进入价值增殖过程，进入生产关系，才能看到其社会历史性，也就是历史规定性，从而破除其永恒性外观。从而就去除其自然法的外观。它不是永恒正义的，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中形成的。这样，才能实质性地发现生产关系，进入生产领域。

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只看到物质生产过程，而不看到价值增殖过程，就很容易出现一个意识形态的效果，即把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的不合理性正当化。明明是被压迫、被剥削、被支配的劳动形态，通过物质生产过程被解释为自主、自由的活动，这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此，马克思之所以要做这个区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从这一点来讲，汤普逊没有进入价值增殖过程、没有进入生产关系、停留在抽象的劳动创造财富因而分配财富的使用价值的抽象劳动层面。在其中，他只能看到自由劳动，看不到压迫；看到一般，看不到特殊，也看不到历史。看不到劳动的历史性，就意味着他的所有学说都是想当然的。他的自由劳动、自由交换、自由享用，都是脱离历史情境的自由，是主观的限定。这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特点。而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不是理想的存在，而是内在于历史条件中，所自己呈现出来的。

汤普逊这样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其替代方案不可避免地具有空想性，因为它主观、脱离了具体历史条件的分析，来随意想象自由的社会劳动。解决它的问题，就只有靠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他对自由、平等、价值追求等，都放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放在具体社会历史的发展中来研究。也就是说，马克思的这种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这就是他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区别。

因此，当汤普逊说“没有劳动就没有财富”，他虽然从分配进入劳动，但他所讲的完全是抽象劳动。今后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习中，也一定要注意：对马克思所使用的概念，不能望文生义，不能看到劳动就认为是实践，看到实践就认为是感性对象化活动。马克思不同文本中“实践”的内涵完全不同。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不同文本中的概念想当然地随意嫁接在一起，而一定要对其内涵，尤其是社会历史的内涵加以具体分析，找准其历史规定性。马克思早年文本的特点：他阅读大量书籍，吸收大量思想。表面上谈那些书里（尤其是费尔巴哈）的概念，但其实已经有了和那些概念之间的本质性差别。

因此，要关注“劳动”这个词的具体内涵，关注劳动的现实性和历史规定性。就劳动的现实性而言，汤普逊比李嘉图还要倒退，甚至走向鲁滨逊式的、孤立的、反社会的劳动。

这样，就可以回到上学期的经典问题：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1844手稿》中，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对象性活动、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而《费尔巴哈提纲》中则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两个命题不矛盾，但有根本差别。前者停留在物质生产过程、理想化的对象劳动中，看不见人和人的关系。“人的本性就其现实性而言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性一定是在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中体现的。看到关系，才能具有现实性。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出现在两个：就格雷而言，是把资本物化了；就汤普逊而言，是把劳动抽象化了。物化的资本和抽象化的劳动是马克思区别于他们、批判他们的地方。他们没有深入到劳动的现实生产领域，而这个领域一定是有现实的生产关系的。

**B 蒲鲁东主义**

蒲鲁东是马克思真正的、一辈子的对手。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恩全集第2版30卷）马克思说，生产关系是交换和分配关系的基础。之所以分配是由生产决定的，因为分配分为两种：(1) **生产结果的分配**，(2) **生产条件的分配**。

生产结果的分配，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分配。英国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谈分配的。然而，生产结果的分配只是一个末端的分配，真正的分配不公平不是在末端，而是在起点。马克思认为，不应该只关注终点的分配、结果的公平，而应该关注起点的分配、“机会的平等”（今天伦理学的概念）——生产条件的分配。

生产条件的分配，就涉及**所有制**的问题。例如，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对于社会总产品再怎么分配都无济于事，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生产条件的垄断已经攫取了生产结果的大部分东西。因此，所有制就涉及生产关系，所以是生产决定分配。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停留在生产结果分配上，而蒲鲁东主义讨论所有制问题——**财产权问题**。

**所有制—财产权—贫困**

蒲鲁东有两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什么是财产权》、《贫困的哲学》**。（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反驳之[[12]](#footnote-12)）这两部书论证了财产权和贫困之间的内在关系。

这是今天政治哲学非常重要的主题，也是英国和法国政治哲学的分野。

在洛克、斯密处，他们认为财产权是用来摆脱贫困的，是摆脱贫困的必要社会基础，都在千方百计论证财产权的正面意义。马克思说“贫困对于斯密来说只不过是为了论证财产权的附带现象。”更可怕的是，很多自由主义者把贫困理解成一种个人能力不足的体现。（这也是今天所谓“成功学”的基础）

法国人则不然，卢梭就意识到，财产权不仅不是脱贫之路，而且是贫困根源。卢梭的这一思想甚至影响到了黑格尔。卢梭说，私有财产不是普遍权利，而是少数富有的人的特权。人生而自由平等，而人的不平等、败坏，就是源自财产权。它“只是让富人守住巨额财富，几乎弄得穷人不能安保自己亲手搭建的草房。”

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两种路线就从这里出现。激进主义的路线，就必然出现黑格尔的保守主义和蒲鲁东、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卢梭的一句话变成了蒲鲁东的一本书《贫困的哲学》。蒲鲁东说，贫困的根源在于财产权。蒲鲁东骄傲地说：财产的定义是老子我下的，我所有的理论都是证明了我是这个时代最懂财产的人。他说，**财产权就是盗窃，几千年来没有像我这样的人，这样来界定财产权。**马克思年轻的时候追捧蒲鲁东，说这是划时代的发现。

蒲鲁东之所以是划时代的，因为他破除了一种前人对财产权的“**‘本质直观’**”。之前人们对财产权的几种本质性看法被蒲鲁东一一击碎：

1. **先到先得**，即**先占权**。

这是我们对财产权的一般了解。马克思年轻的时候学法律，精通罗马法，说“占有是一种无可解释的事实，财产权就是对这种事实的法律追认而已”。换言之，先占不是权利，而只是事实。权利应当是对事实的规范，而不是辩护。马克思对先占权的看法是肤浅的，不如蒲鲁东深刻：蒲鲁东认为，先占根本上是非法的。洛克说，上帝创造大自然，我们可以均等使用大自然，通过劳动从大自然中获得私有财产。然而，蒲鲁东说，大自然本身就是公有的，不分先来后到。蒲鲁东认为一切财产都是按照土地的范例来确立，先占权说白了是对土地的先占，大家以地权为范例。土地是仁慈的上帝赐予每个人的财富，对每个人开放。只要不妨碍别人，都可以得到。并不分先来后到。他借用了西塞罗的一个说法：天下的土地好比一个剧场，每个人都在这个剧场中占座。蒲鲁东认为，西塞罗的比喻已经根本上消解了财产权，因为从西塞罗的比喻中可以推出以下结论：

(1) **占有只能是平等的**。因为，在剧场中，一个观众不能占两个座位。

或者说，蒲鲁东的意思就是说，天下的土地都是公共的，每个人只要不妨碍别人，都可以获得一部分。因此，我们对大自然，不是占有，而是

(1)补 **占用**。所以每个人获得的财富应当是总财富除以人数。

这个推论已经很勉强了，蒲鲁东还有第二个推论：

(2) **占有是变动不居的**。西塞罗的剧场中，观众进进出出，所有的座位就在每一场剧中重新分配，天下财富的份额也就要根据出生死亡人数的变动不断调整。

因此，蒲鲁东说，构成所有权的占有行为既然是偶然事实，就不能用这种偶然事实赋予所有权。总之，他所提倡的就是都要平均分配。

蒲鲁东希望通过西塞罗的比喻，恢复占有的本来含义：变动不居的平均分配，而非先来后到的先占。蒲鲁东这种对先占权的批判是否成立？显然是不成立的。因为他只是用占有原初的含义来批判先占的不平等，却忽略了社会现实——**继承权**。蒲鲁东否认的，其实不是先占权，而是继承权。按照蒲鲁东的理论，父母的财产是不能被孩子继承的，而都要平均分配。

然而，继承权这个问题却非常重要。继承权有两种不同的模式：**平均继承**，以及**长子继承**。长子继承使得兄弟姐妹中天然地截然变成两个阶层，长子成为资本家，而没有继承权的诸子女则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洛克、黑格尔、马克思都无法绕过长子继承权的问题。

很多工人就喜欢听蒲鲁东讲话，不愿意看马克思，因为看不懂。蒲鲁东还有另外两个批判：2. **劳动致富** 和 3. **谁出资谁收益**。具体按下不表。

那么，马克思如何、为何批判蒲鲁东？留待下节课再讲。

**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期7 马克思对社会存在的把握2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4 2019.10.30**

**复习**

马克思要超越交换和分配关系，深入到生产关系中。分配关系有两个代表性的社会主义流派：英国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和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前者有格雷和汤普逊两个代表人物。在对他们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的非常重要的观点是说，分配不仅仅是劳动产品的分配，还是**劳动条件**的分配，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分配。

**蒲鲁东的财产权批判**

和英国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相比，蒲鲁东通过所有权批判，实际上已经进入生产资料分配的环节。然而，马克思为何还要对蒲鲁东展开批评？——二者很多观点看似非常相似，但马克思把蒲鲁东作为他一辈子的对手来批判。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什么是所有权》。在《什么是所有权》中，蒲鲁东对财产权的定义是：财产权就是盗窃。他认为千百年来这是他第一个提出的。

蒲鲁东批判的是三种对财产权的流俗看法。

**蒲鲁东对财产权的批判：1. 先占权　先到先得**

**2. 劳动权　劳动致富**

**3. 收益权　谁出资谁收益**

**结论：1. 财产权＝盗窃**

**2. 正义＝平等＝劳动者平等占有相同的生产资料**

**1.** **先占权 先到先得**

这是一种直观的看法。蒲鲁东把先占回归到占有的原初定义（**西塞罗的剧场比喻**）。在剧场比喻中，蒲鲁东说，剧场座位的分配必须是平等的、剧场有进有出，所以就取消了先来后到，而是随着人数调整每次都要做平均分配。

从蒲鲁东借助西塞罗的剧场比喻对先占权所作的批判中，我们可以发现蒲鲁东的特点：他的确是一个**煽动家**，在语言上能够通俗形象易于理解。然而，这也决定了他的一个弱点：他的理论经不起深层次的推敲。

为何如此？——关于先占权，2个问题非常关键。

(1) 蒲鲁东对于先占权的批判诉诸剧场比喻。这个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回归到占有的原始含义（对占有的**词源学**考察）。在这个词源学考察的过程中，他取消了/遮蔽了一个很重要的权利，即**继承权**。在蒲鲁东处，继承权仿佛就像不存在一样。这实际上是否认了继承权作为**客观的社会存在**。

事实上，资产阶级学者所讨论的先占权，其目的就是为了论证继承权，通过继承权确立**所有权的历史正当性**。

(2) 蒲鲁东要考察占有的**原初**含义。他借助西塞罗剧场比喻，回到了占有的**原始条件**。他的一切批评都是建立在这个原始条件上——这个原始条件，就是所有人都是生产者，所有生产者都共同面对一个大自然/土地/公共财产。这是人类劳动的起源（原始条件）。西塞罗的剧场比喻，就是把大自然比喻成剧场。

**原始条件：劳动者—————————劳动对象**

**现代条件：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

**主体　　　　　中介　　　　　客体**

这种原始条件的分析，其实就是一种理想条件的分析。剧场比喻显然不适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人类直接面对土地、自然、劳动对象的，而经过了**劳动资料的中介**。而原始条件中，只有**劳动者**和**劳动对象**。这一种**直接的生产**。

**2. 劳动权 劳动致富**

劳动致富的观点，其始作俑者是**洛克**。《政府论》中，洛克提出，劳动是所有权的基础。或，**劳动与所有权是同一的**。洛克认为，之所以我占有劳动产品，是因为我生产之。洛克也是从这个原始条件出发，说大化乃上帝之造物，并不属于任何人。这个时候洛克的观点是有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社会的进步意义的。

**洛克→菲尔默：父权制**

**劳动与所有权是同一的**

我们今天往往误解了洛克：《政府论》下编直接讲了劳动所有权、政府应当保护私有财产、自由主义基本政治架构、私有财产比政治更高的原则。然而，**《政府论》上编**往往被我们忽略了。在上编中，洛克批判**菲尔默**的**父权制观点**（为绝对君主的专制辩护）。菲尔默和洛克都认为大化乃上帝之造物。菲尔默则接着说，上帝造亚当，因此上帝等于把整个大自然、整个土地的产权都授予了亚当（上帝的第一个儿子、人类的第一个父亲）。这实际上就是把整个世界想象成亚当一人所有。亚当根据父子继承的原则，再给了人类的其他人，主要就是君主。因此，君主对于国家领土内所有一切都拥有最终的产权。洛克反对这一点，认为普天之下并非王土：大化确为上帝之造物，但**谁能拥有产权**是上帝没有对亚当说过的。我们的私有财产来自我们自身的劳动，大自然则是公有的，在公有的大自然中靠劳动产生私有的产权。例如，河流是公共的，我取一瓢，别人也取一瓢，但“取”（消耗劳动）使得这个水从大自然的公有状态变成了自己的私有状态，赋予之以自己的人格和自由意志。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私有财产是劳动所确立的。由于这是消耗自身劳动获得的，诉诸于我的**自然理性**（吃喝生存劳动），依据我的身体、劳动能力。劳动是我对自己的身体的支配，所以人对自己的身体的支配是绝对的自然法，所以私有财产是自然权利。就此洛克把私有财产上升到了自然法。劳动和所有权的同一性也就这样体现。

理解了洛克的历史语境，就可以发现，洛克的观点的确代表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前进方向，洛克的观点就其历史语境而言是正确的。洛克的论证方式也不免和菲尔默一样在神学基础上展开。马克思对洛克观点的透视，不是从自然法的角度，而毋宁说是社会历史的观点。马克思说，劳动与所有权的同一之所以在洛克的年代可以理直气壮被提出，是因为那时的资本主义生产还不够发达，洛克和斯密都停留在小生产者的社会条件。对于小生产者而言，他对于他劳动的产品确实是具有支配权的。然而，进入机器化大工业，所有权不再表现为以劳动者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为基础，而是以工人丧失劳动产品为基础。马克思认为，洛克在反封建上是有功的，他没有错，错在洛克的徒子徒孙：他们信奉洛克的教条，身体进入到机器化大工业，头脑则停留在小生产者的水平。他们用小生产者条件下的观点为大工业生产的劳动所有权理论辩护，是不可取的。

马克思对洛克的分析是辩证的，是看到了洛克论述的历史语境的。然而，蒲鲁东对于洛克的劳动所有权的批判则不然。蒲鲁东的批判分两步来走：

(1) 洛克关于劳动所有权的论证有一个**致命缺陷**：这是卢梭早就提出来的。卢梭认为，洛克有一个几乎不容易被察觉的缺陷：假设我现在面对上帝馈赠的一片公地，我在其上劳作，其上所有产品都属于我，按照洛克的劳动所有权来看，我拥有的是土地上的出产，比如土地上种的高粱、玉米、水稻、小麦等等，但我怎么可以偷梁换柱说这片土地是我的呢？[[13]](#footnote-13)因此卢梭说，劳动所有权看似是现代文明，但是其实是对大自然的玷污，对人类最纯洁美好的自然状态的破坏。

因此，土地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非常敏感的问题。虽然李嘉图取消斯密三阶级中的地主阶级，认为土地也是生产资料，但马克思却发现绕不开土地问题，《资本论》有大量的内容都在讨论地租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卢梭看出的问题是非常毒辣的。只能拥有劳动产品的所有权，而不能把土地窃为己有。洛克玩的是偷梁换柱的把戏。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蒲鲁东首先借助卢梭的批判来批判洛克。

(2) 蒲鲁东接着退后一步，**就单论劳动产品而言**：洛克认为劳动产品当然是劳动获得的，劳动者当然拥有支配的权利。然而，蒲鲁东说，如果是这样的，那么现在社会应当是平等的。然而，现在的社会为何是不平等的？为什么有人穷、有人富？——在这一点上，蒲鲁东批判了资本家和工人的交换（工人用自己的劳动换取工资），认为工人所获得的工资只是社会财富中的一小部分，而不代表整个社会财富。事实上劳动者没有拿到产品，而只是拿到工资（只是社会总财富的一小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按照蒲鲁东的观点，**工资**对于劳动者而言是一种**无知**（劳动者认为拿到自己的工资就是自己的报酬，但其实他不知道他所创造的是整个社会财富，而拿到的是一小部分），而对于资本家则是一种**诈骗**（巧取豪夺）。

蒲鲁东的这样一种批判和马克思很像，但也只是很像而已。当蒲鲁东讲“工资只是社会财富的一小部分”，他是**从分配的角度**，认为劳动者应该拿到社会财富的全部，而非仅仅是可怜的工资。然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绝对不是一个分配概念，而是在生产中客观出现的，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不可以靠人为的分配取消，而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庸俗的社会主义者始终是从分配的角度理解剩余价值，从而把剩余价值理解成一种人为的结果，认为只要在分配上平等就可以随意推翻，但马克思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

分配维度和生产维度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分配的维度是一种主观的维度，好像这种分配可以通过人为的力量随意改变；然而，生产的维度具有客观的必然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点特别重要。很多社会主义者，包括毛泽东在内，都在此陷入巨大的困境。毛泽东甚至把社会主义运动追溯到耕者有其田、均贫富的五斗米教。毛泽东垄断国家机器暴力，可以用这种暴力强制生产资料公有，进行平等的分配，然而结果却是导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生产资料的倒退。

**3. 收益权 谁出资谁收益**

拿出一笔钱，在银行里之所以有利息，是因为之前付过本金。有的经济学家，还振振有词地说“不能只看见贼吃肉，看不见贼挨打，冒风险才有受益”。张维迎的博士论文就在讲这件事情，为资本家辩护，说老板是承担风险和后果的，工人只是拿了工资就跑。蒲鲁东对这个观点批判如下：

(1) **收益权和劳动权直接就是互相矛盾的**。对这一点的论述，和英国李嘉图派社会主义是一致的。既然所有财富都是劳动生产的，怎么允许有的资本家不付出而占有，不劳动而获取？

(2) **收益权具有反社会的性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所有劳动都是**社会合作**完成的，鲁滨逊式的孤立存在的劳动是不存在的。然而，收益权靠自己的一点点资本就可以获得收益，而不需要通过与他人的合作。蒲鲁东说，财产权人依靠收益金生产，不和任何人合作，所以没有和任何人共享收益的义务。普遍的法则：所有的生产是在社会中完成的，每个人是为了他人，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生产，但收益权是这个法则的例外。所以收益权具有反社会的性质。这种收益权，实际上是资本家对社会产品预先征收的非法税收，且是反社会的税收。收益来自社会劳动，你却窃为己有，这就是你对社会总劳动、总产品的预先争夺。蒲鲁东在这个意义上就说，所以，财产权是一种**盗窃**。他甚至认为财产权是反社会的，所有权和社会是不相容的，要么社会灭亡，要么必须消灭财产权。

这点看似有理，但是老板可以这样反驳：我的投资也是在做社会贡献，创造就业！凭什么说我的投资行为是反社会的？温家宝：“我们企业家应该流淌道德的血液”，很多企业家就说“利益的血液就是道德的血液”，投资在客观上推动就业，不让工人下岗、企业倒闭，就是他们最大的社会责任。

**总结：**蒲鲁东对财产权的1~3点批判都是表面看似有理，不能经受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反驳。蒲鲁东的这三点批判，有一个主线，即其最高原理：**平等**。不平等就是反社会，反社会就要取缔。先占权、劳动权打破平等，收益权扩大不平等。因此，蒲鲁东是从平等的价值原则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私人垄断的所有权。在这个意义上，蒲鲁东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

**1. 财产权＝盗　窃**

**2. 正　义＝平　等＝劳动者平等占有相同的生产资料**

这样的学说很浅显易懂，易于被工人接受。蒲鲁东把社会学变成算术学，工人一听一算都觉得有道理。然而，它恰恰站不住脚，因为财产权就是盗窃是站在分配的角度来讲的。老板如何反对蒲鲁东？老板如何抵制工会主席？——只要说“只见贼吃肉，不见贼挨打”，我亏损了，损失是我的，工资照给，拿了工资可以跑路，但老板一个人面对破产窘境，到底是谁盗窃谁？

马克思在很多方面，立场/观点上还是和蒲鲁东比较接近的。然而，马克思为何对蒲鲁东如此不满？（马克思又不是资本家）为什么马克思把蒲鲁东作为一辈子的对手进行批判？这个批判到底意味着什么？

**直接原因：**马克思和蒲鲁东一开始关系非常好，在《神圣家族》里也高度赞扬蒲鲁东。认为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权》在经济上有划时代意义。然而，两人很快分道扬镳，马克思一辈子撕蒲鲁东[[14]](#footnote-14)。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就是不断地同自己的朋友从欣赏到决裂，除了恩格斯他没撕过。青年黑格尔派、蒲鲁东、德国社会民主党……

1846.5马克思和蒲鲁东的通信中，马克思邀请蒲鲁东担任共产主义同盟（《共产党宣言》之后形成的无产阶级联合，在各个国家招募有影响力的代表作为通信员）在法国的通信员，为社会主义革命一起工作。蒲鲁东写信婉拒了蒲鲁东的请求。在信中，蒲鲁东说，他不希望暴力革命，而是希望改良，用他的原话说“用文火烧掉私有财产”。蒲鲁东也讲科学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运动应当有一个科学，应当找到资本主义的规律，并找到正确摆脱资本主义的道路。然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础上的，蒲鲁东则寄希望于改良，而不诉诸暴力革命来造成资产阶级瓦解。

蒲鲁东回信后，马克思很生气，就写了篇文章：**政治冷淡主义[[15]](#footnote-15)**。所谓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也属于他给蒲鲁东贴的很多标签。马克思认为，在蒲鲁东的理论中找不到革命的位置。（马克思对很多人的理论批判，起点都是现实政治上的意见不合，由此思考理论深层的问题）

蒲鲁东为何在社会变革的观点和马克思如此不和？——他从分配的角度理解财产权、从而也只是从分配的眼光来理解共产主义运动。他认为，共产主义也是一种不合理的分配。他说，如果资本主义的财产权是以强凌弱，那么共产主义就是以众暴寡。他认为，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很庸俗的分配运动，这种分配极其暴力、粗陋、不明智、不科学。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长达一生，因为蒲鲁东的影响力实在太大。在1850~1870s，曾经有这样一句话：在当时罗曼语地区的工人除了蒲鲁东著作之外找不到精神食粮。蒲鲁东影响力之所以大，有4点原因：

1. **平等的诉求**使其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煽动性。

2. **财产的均分**。平等的诉求落实下来，就是财产的均分，这可以给工人带来直接的好处。通过财产均分，耕者有其田，直接就提高社会地位。然而，这容易引起小富即安，这也是工人阶级运动容易陷入低谷的原因，只要有一点好处就要放弃革命。马克思的所有理论最后都要诉诸劳动者绝对贫困，但贫困的绝对化很难形成，甚至会出现大量工人贵族，这是马克思的问题。

3. **改良的方法**：不需要流血牺牲就可以获得财产。

4. **非凡的个人魅力**：经不起推敲但又深入浅出的大众宣传。蒲鲁东的观点在理论上虽然站不住脚，但煽动工人绝对足够。这使得蒲鲁东有很大影响力。

那么，蒲鲁东的改良方案究竟是什么方案，怎么认为文火就可以烧掉财产权，而不需要暴力革命？

蒲鲁东所讲的科学社会主义，是认为可以运用资产阶级的财产权理论实现财产权的翻转。蒲鲁东认为，可以通过社会改良，就实现财产权的盗窃性质的消除。因此他拒绝官方、拒绝无产阶级专政、拒绝无产阶级政党、拒绝马克思主张的共产主义运动。因此，蒲鲁东的特点是仇富仇官仇组织。蒲鲁东的方案非常简单：他认为，我们可以运用资本主义现在的经济组织和劳动方式，只要在分配和交换层面进行改革，在全社会直接地公平分配劳动产品，就可以完成社会改良目标。而且，完成这个目标，靠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靠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盟、合作。

蒲鲁东拒绝一切无产阶级政党，所以也被称为**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力一度很大，巴金的笔名就是取自两个无政府主义领袖巴库尼和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在蒲鲁东处，就是一个含义——不需要通过政治，只需要通过社会自己的改良，就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使用价值、交换价值**

**构成价值、综合价值**

那么，蒲鲁东如何进行改良？

蒲鲁东也研究政治经济学。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所有矛盾都来源于一个地方：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讲，都出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蒲鲁东就提出了一个自创的概念[[16]](#footnote-16)：**构成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构成价值形成**综合价值**。

蒲鲁东说，劳动者要想摆脱贫困，就要进行生产。然而，劳动者这时候所想要生产出的价值是使用价值。然而，受制于分工，劳动者只能生产出一种使用价值，而生产不出他所需要的全部东西的使用价值。他的吃穿住行不能只依靠一个人来解决（蒲鲁东也强调劳动的社会化、协作）。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交换过程，产生交换价值。交换价值的本意，是让劳动者能获得更多劳动产品而摆脱贫困。然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矛盾：随着越来越多的产品进入交换体系，交换价值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贬值。这就是供需关系不平衡的原理。

蒲鲁东看来，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最根源的矛盾。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矛盾，是因为交换价值在市场买卖中完成，而在买卖中大家都在讨价还价。讨价还价，在蒲鲁东看来，就是就是争夺构成价值，大家都要实现自己的价值最大化。讨价还价扭曲了交换价值，使得交换价值出现和使用价值的偏差，不能准确反映使用价值。因此蒲鲁东认为，资本主义所有的矛盾是交换价值偏离使用价值，所以要**取消交换环节**，完成两种价值的同一。这样，就可以使交换价值如实反映使用价值。

蒲鲁东认为合理的交换价值是构成价值、综合价值：

1. 综合价值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也是两者的等同，意味着供需矛盾的彻底平衡，要多少生产多少。

2. 构成价值要准确衡量每一个工人的劳动在整个社会中的创造财富的比例，也是综合价值。

因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最后的结论就是**取消交换**——不再用以货币为基础的交换，而改用**小时券**。设立劳动银行，劳动多少时间，就拿多少时间的钱。

蒲鲁东的改良方案，意图通过交换环节的取消，使得劳动者都能平等地占有相同的劳动产品和生产资料。他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出发，为了让二者等同，诉诸于取消交换环节，让生产的产品**直接平等分配**。这里的关键点就在于**直接**，平等寓于直接之中。市场经济之所以扭曲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关系，是因为它是间接的。间接，就导致扭曲，就导致综合价值的瓦解。一句话，“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马克思的批判：蒲鲁东并没有取消货币，只是把劳动小时券变成了货币。生产的间接性、合作性是无法取消的，只要有这些性质，交换就是无法取消的。只是取消交换的形式（货币）没法取消交换本身。

从蒲鲁东的理论中，可以看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他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最大的差别：**蒲鲁东把价值下降到了价格的层面**。价值和价格不同。价格在市场买卖中形成，其高低取决于市场供需调节关系的平衡。然而，价值不是在交换当中所形成的，是在生产中形成的，由劳动时间决定，所以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二重性是通过劳动进入到生产领域分析的。马克思发现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一般劳动创造价值，由此从劳动价值论一步步进入剩余价值论。蒲鲁东则把价值归结为价格，一切归结到交换，所以丝毫不关心价值如何形成，而只是通过构成价值学说和综合价值学说希望让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绝对匹配。因此蒲鲁东把价值学说变成了市场交易的价格决定，表面上讲价值，实际上讲的是价格。

**以平等为基础的小生产者所有权　工场手工业　前店后厂**

马克思对于蒲鲁东的批判不是仅仅局限于此。蒲鲁东的社会改良方案取消货币，这是马克思所批判的。然而，马克思更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蒲鲁东会形成这样的思想？为什么如此迷恋社会合作社，而不是从根本上用暴力革命的方法摧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所讲的暴力革命，不是简单分配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财产权关系、所有权关系，而是生产力意义上的革命，消灭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马克思说，蒲鲁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是一个法国人。法国是一个小生产占据主体的国家。因此，蒲鲁东的方案也好，理论诉求也好，都是为了**保护小生产者的利益**。因此，他形成了一种**以平等为基础的小生产者所有权/私有制**。这是法国特性在蒲鲁东理论中的反映。蒲鲁东的理论体系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因此，马克思说蒲鲁东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17]](#footnote-17)**——我拥有我一定的生产资料就万事大吉。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什么区别？——以平等为基础的小生产者所有权，在马克思看来，停留在了**工场手工业**的阶段。形象地说，它的模式是**前店后厂**，柜台后面就是作坊。由于采取这种前店后厂的生产模式，蒲鲁东就会自然地认为，后厂的劳动是没有问题的，工人生产劳动产品，问题出现在前店的交换中，出现在交换价值偏离了劳动生产的使用价值，简单来说“商人太坏，工人无罪”，商人通过讨价还价压低了交换价值。因此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和他小生产者所有制的社会背景密切联系。

马克思对此的批判则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工场手工业是注定要被淘汰掉的，必然要被机器化大工业碾压。机器化大工业只需要通过**倾销**就可以碾压工场手工业（例如中国近代的“土布洋布”之辩，民族工商业的土崩瓦解）。德国魏特林派社会主义，就是土布代表者（魏特林就是裁缝出身），仇恨资本主义机器，主张捣毁机器（里昂起义、西西里纺织工人起义）。然而，马克思说，机器大工业生产是无法避免的。马克思说，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以机器化大工业为基础的（《共产党宣言》）。小资产阶级要么通过兼并变成资本家，要么被兼并变成无产阶级。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说，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制造尼龙、麻布、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那些纺织品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社会关系和生产蒲鲁东进入到所有权的批判，了解生产关系。但他不能意识到生产关系不是永恒不变的，而也是历史的产物。小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在历史中产生的，也要在历史中灭亡。生产力的变革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蒲鲁东只看到生产关系，而没看到其随生产力的变化。马克思反复强调机器大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区别，就是要强调，如果不看到生产力的维度，就没有办法看清生产关系。蒲鲁东主义只是一种空想。生产力的变化会引发生产方式的变化，生产方式的变化引发生产关系的变化。工场手工业生产下的小工业主所有权是不可持久的，是必然会消灭的。

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没有进入生产力的层面，因为他陷入了**哲学的贫困**。蒲鲁东发现，资产阶级的经济矛盾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光是强调生产力是无法解决的。他通过一系列**范畴**来推演：

**分工—机器—竞争—垄断—警察捐税—对外贸易—信用**

1. 一开始强调**分工**，分工创造了生产的全面性，使得人们可以获得多种使用价值和劳动产品，分工的初心是摆脱贫困，但现实则是使得工人陷入麻木、消沉、片面化，这就是分工的矛盾。

2. **机器**使得劳动者恢复原状，成为完整的人，避免分工的片面性。所以蒲鲁东认为机器是分工的扬弃。（蒲鲁东用了黑格尔辩证法，他的看法和马克思截然相反，因为蒲鲁东这里所说的机器不是机器大工业的机器，而后者是分工的彻底化，工人片面化发展的极致，工人变成了机器的零件，从活生生的人变成抽象的手）机器带来廉价的商品，就出现倾销，反而使得劳动者贫困，这是机器的矛盾。

3. 机器的矛盾通过**竞争**解决，竞争使得每个人获得自主权，摆脱失业，但竞争也在夺取劳动者的面包。因此，竞争必须发展成**垄断**，垄断能够解决竞争阶段劳动者面包被夺取的问题，但不能让工人自由地生产消费，所以就又导致贫困。

4. 这时候就要依靠**警察和捐税**，是依托国家机器对垄断的反抗，但仍然导致贫困。

5. 因此要通过外部的方法，即**对外贸易**，说白了就是海外殖民，缓解内部矛盾，从国家的外部来救济。然而，世界市场导致巨大不确定性，所以也会导致贫困的问题。

6. 因此通过**信用**来解决，银行要贷款，贷款有利息，所以又让工人贫困了。

蒲鲁东通过以上的论述，发现资本主义生产力内部无法解决工人贫困问题，而只能缓和，却在缓和中彻底推进了贫困。所以蒲鲁东认为无法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解决工人的贫困。对于以上推理，马克思说：“蒲鲁东仅仅从黑格尔处搬弄了一套正反合的术语，把每一个范畴都变成了一个好的方面和一个坏的方面，把好的方面保留，坏的方面去掉。然而，黑格尔辩证法则是说，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都是事物本身，坏的方面必然伴随好的方面，是不能说取消就取消的。[[18]](#footnote-18) 因此蒲鲁东丝毫不懂辩证法，陷入了哲学的贫困。更重要的是，蒲鲁东把范畴当成经验的提炼，想要保留好的方面，去掉坏的方面，却不知道，这些经济范畴都是人们的生产关系的反映，而且是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反映。总而言之，蒲鲁东只懂得财产权，却不懂得这种生产关系如何通过生产力被决定。因此他停留在小资产者的浪漫想象，而看不到机器大工业生产下的普遍悲剧。

因此，这个批判提示我们，不能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庸俗化、公式化。不能把生产力仅仅看成一个实体、一个社会部门，而是要看成一种**视界**。即，站在哪个维度上把握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眼光的问题。强调生产力不是实体，而是视界，这一点在马克思的蒲鲁东批判中得以体现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期8 马克思对社会存在的把握2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5 2019.11.6**

**马克思和蒲鲁东的比较**

马克思和蒲鲁东的思想分歧是一系列的。以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说：

**蒲鲁东：构成价值——取消交换—生产关系—形而上学—小资社会主义（个体）—工场手工业**

**马克思：劳动价值**※**—消灭资本—生 产 力—唯物史观——共产主义（社会）—机器化大工业**

※ **劳动价值🡪剩余价值**

蒲鲁东完全抛开生产、劳动的领域来谈商品价值的形成，在市场交易中看价值。**构成价值理论**。这是把价值等同于价格。价值由劳动量决定，但蒲鲁东所讲的价值其实是价格的讨价还价。

马克思则是**劳动价值**论。关键要得出**剩余价值**理论，要在物质生产领域发现整个社会不平等，或者说构成支配、剥削、压迫关系的根源。

蒲鲁东由构成价值理论出发，得出的革命方案，就是**取消交换**；马克思的方案则是**消灭资本**。蒲鲁东认为，取消交换、货币，是因为交换和货币扭曲了构成价值，使得交换价值偏离使用价值；因此，让交换价值符合使用价值，就是要把一切交易中间环节取消掉。他和马克思之间很大的区别是，蒲鲁东局限在**生产关系**内进行社会变革，而马克思则进入到**生产力**的维度。《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说，蒲鲁东并不是不懂生产关系（说财产是盗窃的时候已经明白了），但是他不明白生产关系本身也是被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不知道生产关系的由来，限制在生产关系中。

那么，蒲鲁东为何不考虑生产力？——考虑贫困问题的时候他考虑了11个范畴，而其构建则是说，本来每一个范畴都是为了消灭贫困，结果加剧了贫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消灭贫困。因此蒲鲁东并不转向生产力变革。蒲鲁东的范畴论证被马克思称为是一种哲学的贫困——诉诸于这样一种**形而上学**。

为何如此？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平等形而上学：**从上节讲到蒲鲁东的所有权批判，可以看出，他所有批判都是基于平等原则，是以平等原则为核心批判一切现实。平等作为一个范畴成为一个绝对的尺度，却不明白平等也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所以蒲鲁东是一种平等形而上学——一切从平等出发，以平等为尺度和目的，而根本不考虑平等的实际内容和展开过程。这是其形而上学的第一个表现。

2. **范畴中心主义：**蒲鲁东从分工到机器到交换到竞争再到……到所有权，这是一个范畴表。他以这些范畴为中心，但这些范畴并不等于现实，因为他对于这样的范畴仅仅进行概念的考察，却和我们现实中的理解大相径庭。例如，“机器”：蒲鲁东把机器视为范畴的时候只能看到机器和平等的关系，认为机器之所以是分工的扬弃状态，是因为分工是生产的扩大，意图解决工人贫困状态但加剧之，因为工人陷入异化劳动，越来越精致的分工使得工人的劳动被矮化。因此诉诸机器，因为机器让工人和劳动条件重新结合，使得工人成为机器的主人。然而，这需要区分来对待：工场手工业阶段工人的确是机器的主人，但在机器大工业的时代工人是机器的零件，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工人被沦为了器官、抽象的手。蒲鲁东的机器解读根本不考虑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变化，所以是范畴中心而非现实中心的。

3. **庸俗的辩证法：**蒲鲁东把每个范畴都分成好的和坏的方面，认为坏的东西应该被扬弃，好的东西应该被保留。这就是蒲鲁东所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范畴运动，任何一个经济现实都可以分解为二，趋利避害）。但这是对辩证法的最大误解。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从来都不是说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像切西瓜一样分出好坏。真正的辩证法，是说好的和坏的其实是同一个东西。蒲鲁东认为，他的理想方案保留了从分工到所有权所有范畴的积极因素，只要取消交换、取消货币就能把所有不利因素消除掉。这就是庸俗的辩证法。

从以上方面来看，蒲鲁东的确处于哲学的贫困。与蒲鲁东不同，马克思则是诉诸唯物主义，准确说来是**唯物史观**。他从来不把分工、机器、竞争看成范畴，而就是现实。不是考察分工概念，而是考察其实际状况。在一切实际状况中都看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例如，机器的确在生产力上带来了极大进步，但是在生产关系上也有巨大问题，让工人彻底矮化。所以马克思对机器等的所有分析都会坚持一个原则，即无论那时候的机器还是现在的人工智能等等东西都是无罪的（它们都是生产力层面的），而有罪的是这些东西的**社会应用**。也就是说，机器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社会关系中，起到的作用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例如，以网络为例，没有网络的公司，没有资本主义对网络的利用，那么网络空间就应该完全是平等开放的空间。然而，网络中出现信息的不平等，这是网络的社会应用而非网络本身带来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对机器问题、科技问题的基本立场。

在今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例如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他们和马克思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哈贝马斯**（法兰克福学派最后一位大师）**《科学技术是一种意识形态》**：这样一个思路的由来，是从卢卡奇开始的，准确来说是从韦伯开始的。**韦伯**发现，现代生产在科技作用下越来越形式化、理性化（工具理性的状态），由此构成“**理性的铁笼**”，这是我们无法取消掉的。卢卡奇根据韦伯的理性化过程得出了一个重要概念：**物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分工的发展、生产组织化程度提高，那么工人的物化/合理化/异化状态就会越来越加剧。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西马得出的结论是，科学技术不是解放的根源，而是压迫、异化的根源。马克思说“生产力发展没问题，但我们要变革的是社会关系”，但卢卡奇认为“生产力本身就带有原罪”。这样一个观念发展到哈贝马斯，就会得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而非生产力发展的体现”的结论。因此从卢卡奇到哈贝马斯，他们就抛弃了生产力—生产关系批判的维度。在劳动方式、经济层面上无法对资本主义进行改变，因此只能诉诸于意识的改变——反抗物化，形成**总体化**的意识，即**阶级意识**。**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就是如此，把革命希望全部寄托在阶级意识。卢卡奇认为物化是分工的现实，会进入到人的心灵深处成为物化意识。其如何进入心灵深处、统治人们的心理状态的问题，**齐美尔《货币哲学》**作出了很好的回答。按卢卡奇的说法，人对社会只能形成一种片面认识（通过物化意识），无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进行全面把握。这种观点在法兰克福学派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马尔库塞**。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中的单向度思维、单向度的人和物化意识是同样的意思，是说人的批判意识的彻底瓦解，例如娱乐中获得感官满足，丧失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理性批判。所以卢卡奇说，要摆脱物化意识，就必须要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总体性的把握，从而建立工人的理性批判、反抗的意志，建立阶级意识。

在这个过程中，卢卡奇其实把马克思变成了黑格尔，因为黑格尔哲学的观念：当一个现实对象能在理性层面上被我们全面反思、把握，那我们其实也就超越了它。卢卡奇的物化、马尔库塞的单向度思维，都是说，在社会现实当中无法跳出来反思，而永远在内部打转，思维是社会现实的被动反映。因此只有靠自己的意识对社会现实总体进行全面把握，一旦全面把握就意味着已经超越了社会现实。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个方式叫历史分析之点就是历史超越之点。卢卡奇对革命方案重新改写：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导致革命，但卢卡奇则认为这在当代社会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并不贫困，所以只能诉诸于无产阶级“非常无聊”：反思层面、理性层面非常贫乏的物化思维、物化现实。因此卢卡奇认为可以通过阶级塑造（意识层面）重新赋予工人以革命主体性。从卢卡奇开始，整个西马，一直到1968五月风暴之前，都是诉诸文化、心理层面，而不去探讨生产力内部的解放维度，认为科学技术只能带来奴役。这是马克思和后来西马的很大的区别。马克思从来不讲科学技术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幻的东西，而认为科学技术本身就是客观生产力，之所以对人构成异己性的关系，是因为其社会应用形式出现了问题。强调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强调生产力维度，是对今天的西马批判非常重要的。

蒲鲁东诉诸形而上学，而马克思诉诸唯物史观。因此，两个人的政治方案也是不同的。蒲鲁东是**小资社会主义**，而马克思则是**共产主义**的。蒲鲁东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是看不上的，因为他仅仅把共产主义理解成一种分配层面的共产主义，只是简单理解成“劫富济贫”。因此蒲鲁东反对用共产主义暴力手段来反对资本主义，而是要用“文火烧掉财产权”，资本主义恃强凌弱，而共产主义以众暴寡。然而，马克思在《1844手稿》中就已经把这种共产主义抛弃了，斥之为“粗陋、原始的共产主义”。蒲鲁东在分配层面上建构的社会主义，是希望所谓的正义和平等是劳动者能够平等占有自己的一份生产资料。但这其实在马克思看来非常可笑，因为就是回到了工场手工业普遍私有化的阶段。马克思对此的最大反驳来源于，蒲鲁东根本看不到机器大工业对工场手工业的不可逆转的替代趋势，想用工场手工业的旧船票登上社会主义的未来之船，这就是一个历史的错位。

因此马克思认为，这种小资社会主义是不现实的。马克思所讲的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是，对于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进行一系列的总体性变革（革命），而这是在社会层面完成的。蒲鲁东的方案，诉诸小资产阶级各有各自生产资料，其实是在个体层面上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强调的是**社会**，而蒲鲁东强调的是**个体**。马克思强调生产的社会化、全面共享社会成果、通过社会办法扬弃资本主义，这是两者很大的区别。因此蒲鲁东的小资社会主义必将体现为政治上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因此蒲鲁东根本不寄希望于无产阶级能够完成革命（无产阶级和大资都没法完成，只有小资可以），他的革命方案就像他的哲学一样，像是一种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调和，调和成一种个体平等的私有制。但对于马克思而言，这种调和则是首鼠两端。小资的经济方案在蒲鲁东处转换成一种反对共产主义、恐惧社会化总体革命、期望个体变革的政治方案，从而转化成一种精神气质，讲得好听是稳重、和谐，讲得难听就是猥琐、投机。从这里开始，马列对于小资产阶级就有一个完整的定义：**两面性**。一方面同情无产阶级有一颗圣母心，另一方面又会自觉不自觉地投靠大资，又有一种个体主义的理想精神，恐惧暴力希望和平，恐惧集体希望个体自由。用两个词来形容，就是骑墙与暧昧（这也是文艺青年的风格）。慢慢地，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就变成了“我不care这个社会，只关心个人生活浪漫情调”的今日之文艺/小资风格。

马克思、蒲鲁东的区别中，可以看到，两者的**生产力定位**不同。蒲鲁东始终停留在**工场手工业**的阶段，而马克思强调的则是**机器化大工业**。因为，机器化大工业必然会使得社会简化成2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不会出现第三个阶级。根本就没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容身之地。

通过蒲鲁东和马克思的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对于这样一种生产关系，最后必须深入生产力的维度、界面，才能深层次透视。如果没有生产力自觉，就会陷入蒲鲁东式小资社会主义的幻想。小资产阶级虽然美好，但挡不住机器大工业的滚滚洪流，这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必然性。

因此，什么叫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不是看成实体，而是分析社会的一个界面、一个视野、一个视域。要进入生产力的层面把握社会。《哲学的贫困》这本书，在这个意义上，才之所以代表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成熟。

马克思发现了蒲鲁东的各种问题，但历史发展的现实却告诉我们，今天蒲鲁东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主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总体性革命没有如期到来，甚至今天最大的号称社会主义国家（众笑）冠上中国特色的名义恢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崔之元**：今天改革开放市场，不就是蒲鲁东主义？——崔之元直接把中特认为是蒲鲁东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彻底但遥遥无期，蒲鲁东主义虽然肤浅但大行其道，这就是20世纪共运的历史之谜。

**“决定”是一个历史过程**

我们回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来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是**视域**，因此某种程度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是从生产力的界面透视生产关系。

那么，什么叫“决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我们可以看到“决定”就是**赋予规定性**。而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这种决定—反作用，不是**抽象的作用**，而是**历史的作用**。意思是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不是在知性的层面上的抽象决定。我们深受教科书体系影响，认为这种“决定”是抽象决定，而这是一种教条化的理解。不是说“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把它革掉”，而是说，即使我们要说“规定”，也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函数方程式的过程。

决定是历史过程，而非抽象知性观点（教条方式、抽象方式规定一切现实）[[19]](#footnote-19)。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过程需要经历一系列中介、一系列历史运动才能发生。这样理解，才能超越“知性的理解”，达到“历史的理解”。

**中世纪：城乡对立🡪农奴自由🡪手工业**※**🡪行会制度🡪师徒之间的宗法关系（人身依附关系）🡪等级资本🡪商人🡪工场手工业🡪商业资本（重商主义）🡪国家力量🡪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集中在一国🡪机器大工业🡪工业资本🡪世界市场🡪传统生产关系解体**

※ **手工业🡪短工🡪无组织的平民**

回顾**《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论述：马克思在《形态》中曾经谈到一个重要问题，即社会的分工，资本主义如何取代中世纪封建社会关系的过程，这是基于生产力进步而致的生产关系巨大变革和解放。对此，马克思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论述。他首先讲，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之间的最大分工是**城乡对立**。无论马克思还是韦伯，都把城市作为现代（性）的起源。韦伯和马克思都专门分析了城市和城乡对立。中世纪条件下的城乡对立，意味着（参照〈资本主义生产前的诸形式〉三种共同体都是在村社中展开的，而《形态》则是从城乡对立出发）城市对乡村的支配。城市空间的出现引发了一个后果：农奴不断逃离农村进入城市变成自由民。在这种情况下，**农奴获得自由**，进入城市，就带来了**手工业的发展**。这样一种手工业，是**行会制度**下的手工业。在讲这一点的时候，马克思特别提到：自由农奴之所以进入城市手工业领域，之所以会进入行会制度，一定会要寻求一个行会的庇护，是由**劳动条件**所决定。手工业的手，是神秘性的手。手的神秘性，意味着**技艺**的存在。技艺需要培训，必须要拜师学艺。具有技艺特征的劳动，和手艺没有区分开来（而今天则是区分的，进工厂工作不需要培训）。因此，必须进入行会。

不进入行会的劳动也是有的：**短工**。马克思说，短工是不需要进行劳动技艺培训的。这种短工，就会发展成**无组织的平民**，和手工业者区别。

在这种城乡对立的局面下，马克思去解释为何反对城市的起义在中世纪全部以失败告终。理由有三点：1. 农民分散起来，没有组织化力量，所以无法反抗城市；2. 城市平民也没有组织起来，所以无法反抗城市；3. 手工业者也无法反抗城市，因为这些手工业者被组织是通过行会，但行会和行会之间是彼此隔绝的，也没有形成组织化的力量。因此，组织化的缺失，就会导致中世纪对城市的反抗都宣告破产。

行会制度形成了**师徒之间的宗法关系（人身依附关系）**。行会的头是师父，师父按照他的利益来组织、分配给徒弟，徒弟维护行会的利益。二者就形成了师徒人身依附关系。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就意味着这时候是有**等级**的。这就意味着，**劳动者**是**无法独立**的。

资本主义兴起有2个条件：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分离；劳动者必须成为一个自由劳动者，可以自由买卖自己的劳动力商品。行会中是不可以自由买卖自己的劳动力的，人身依附于自己的师父。这种人身依附，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还有两个地方能看见：德云社和本山文化传媒公司（众笑）。赵本山拍《乡村爱情》搞刘老根大舞台，就是行会，甚至发展到后来是帮会。二人转什么的需要技艺，所以必须磕头拜师，赵本山收徒弟必须三拜九叩。郭德纲门下，有些人想要解脱这种宗法人身依附关系称为自由买卖劳动力的独立劳动者，就成了德云社的“叛徒”。

师徒之间的宗法关系（人身依附关系）表明这时候资本仍然在一个比较初级的发展状态即**等级资本**。等级资本与现代资本不同：现代资本以货币形态为主导，资本就是钱，这样一种现代资本其实是抽象的；而过去在行会制度、手工业状态下的等级资本则是没有完全货币化的，是有等级的手艺，并且依托于身份等级、自然因素，没有完全抽象化。这时候的资本，除了在技艺上有等级，在管理上也有等级，有人身依附关系，有老板和奴隶。现在高校里面很多研究生和导师的关系也是这样。这种等级资本、宗法关系、行会制度之所以在中世纪非常顽固，是因为劳动者没有实现充分流动，没有独立化的地位，只能依附于行会、师父[[20]](#footnote-20)。劳动者之所以不能自由流动，因为商品关系（商业）、社会分工没有充分发展。如果商业交换关系一旦普遍化，一定会带来劳动者自由流动和行会制度的瓦解。行会制度的牢不可破和生产力条件密切相关。因此，马克思说，手工业状态下分工程度低、劳动力水平低下，才会出现等级资本。

这样的等级资本如何被瓦解？

中世纪时的分工非常低下，仅限于行会，甚至行会内部没有什么分工。它局限在城市的内部。这时，出现了**商人**。商人使得城市内部的分工走向城市和城市（纺织业和制造业，例如）之间的分工。商人群体的出现，意味着生产和交换的分离。因此，从手工业形成了**工场手工业**（手工作坊）。马克思分析说，工场手工业对于商业是具有依赖性的，这也是其和之前手工业的最大区别。后者是可以在帮会中自给自足的，但前者的生产是由商业决定，由订单决定的。马克思说，商业资本在这个意义上决定了工场手工业。其实这时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过去交换是为了生产，现在生产是为了交换；过去生产什么就卖什么，现在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而商业则很少依赖工场手工业：你不干也有别人干。因此，在工场手工业的阶段才会出现**重商主义**、出现斯密（斯密在重商主义之后）、出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商业文明。这个时候的资本，便不再是等级资本，而是**商业资本**。

变成商业资本之后，在政治上的效果，就是**国家力量的出场**。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中间必然出现绝对主义君权统治，因为商业资本依赖于国家的力量，国家是商业的主导者。国家是商业的主导者，体现在：1. 对外殖民，开阔市场；2. 对内关税保护制度（贸易保护主义），防止外部商品冲击、倾销。国家力量由此崛起。马克思说，这个时候的商业就开始具有政治意义。因此随着商业交换的扩大化，手工业变成工场手工业，形成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早期资本主义不在英国、法国、德国，而在意大利、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这些国家的生产方式都是工场手工业的，而且这些国家都是当时的商业国家，在海上争霸希望建立商业霸权。荷兰被称为“海上马车伕”，就是这样。

因此在这个阶段出现绝对主义君权，出现对国家权力的强调。这种国家力量出现后，就会产生出一个现象，即**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集中在一个国家**。以国家为单位展开贸易竞争、商业霸权的争夺。最后，脱颖而出的是英国。之所以是英国，是因为它通过工业革命进入到更高的生产力阶段：**机器大工业**。机器大工业是工场手工业经过商业条件、尤其是国家垄断条件下形成的。工业革命不是随便发生的：工业革命有一个很重要的、值得重新研究的现象，过去我们总认为工业革命靠瓦特，瓦特脑子没有瓦特（众笑）发明［改良］蒸汽机导致工业革命。历史学家要研究为什么工业革命是在当时的英国而非其他国家发生。彭莫蓝等人解释工业革命出现在英国而非中国等国家，在他们看来，工业革命率先发生的地区都是煤矿集中的地区。但这个解释也有问题，比如我们山西煤矿也很发达（众笑）怎么没有工业革命。马克思发现，工业革命往往是在纺织业率先发生的。因为，纺织业原来都是工场手工业，进一步通过技术革命、煤矿资源丰富，更重要的是，这些纺织工场全都在河边（没有发明蒸汽机之前必须通过水能操作、河道运输，这就是工场手工业和商业的结合），而且对工人技艺要求很低，没有受过文化训练的人很多都可以进入纺织业。因此马克思强调，机器大工业是从工场手工业发展的，机器大规模运用使得生产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这时就不再是商业资本，而是**工业资本**。英国人之所以能一举取代西班牙、荷兰、意大利成为新的资本主义霸主，就是因为用工业资本代替了商业资本。商业资本脱离制造业实体工业是无源之水。工业资本出现后，就带来了**世界市场**。英国工业革命一方面让自己成了世界工厂，一方面让世界成了世界市场。这样，英国就可以对其他国家展开倾销（“洋布冲击土布”），这样的世界市场商品竞争关系和国家利益主导保证的贸易自由形成了竞争关系的普遍化，彻底终结了行会制度和手工业/工场手工业状态。机器工业又好、省人工、便宜，有强大国家力量保障。世界市场的竞争关系普遍化，就引发了**传统生产关系的解体**。

马克思强调，从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从中世纪到现代，经过绝对主义王权时期，这个社会形态的演变是生产形态的演变，也是资本形态的演变，同时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马克思所讲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经过一系列中介的，是有条件性的，而不是抽象的。“决定”二字里面包含着一部世界历史，是历史的决定。交往扩大、国家出场、贸易保护与贸易自由共同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

马克思在这个意义上描述了一个很深刻的东西：**机器化大工业时代的现代性图景**。“现代性”是近20年来中国学界最为流行的概念，我们一切目眩神迷无所适从都来源于此。之所以这个概念在中国非常火爆，是因为1980~90s中国“拥抱现代化”，现代=好，“走向未来”，探讨“东亚四小龙怎么就能现代化转型”。但1990s，市场经济果然来了，中国人却发现“我们终于读懂资本论了”，过去我们认为资本论就是骂资本主义，结果现在发现它可以解释我们自己了（众笑）。大家发现现代化并不如玫瑰色一样美好。因此就有了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反思。对韦伯、海德格尔、尼采的阅读都离不开对现代性的阅读和思考。

马克思看来，现代性就是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秘密就是现代生产——机器大工业的生产。

那么，机器大工业的现代生产带来什么样的现代性图景？

1. **竞争关系普遍化。**机器化大工业条件下，形成世界市场，因此竞争关系普遍化。不竞争就等于死亡，羚羊必须比狮子更快。《共产党宣言》：“资产阶级所有生产力生产关系，所有一切都要不断变化，技术不断创新成本不断压缩销路不断开拓，浮士德的‘永不停歇和魔鬼交易’精神代替岁月静好，一切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不断出新出奇。”（不是原话）关于这点，尼采说，现代社会是“晨报代替了晨祷”。过去在传统社会下，每天早上行晨祷的动作是固定的；而现代社会，晨报永远不可能是在看同一张报纸，2019年看1979年审判四人帮的报纸叫“穿越”，永远推陈出新。然而，过去晨祷的仪式生活有内在的内容，而现在晨报形式的不断变化却导致精神内容的无聊，导致一种视而不见的生活习惯，在晨报中永远不可能收获心灵的平静。以至于麻木和厌倦、虚无和空洞。虚无一定是在竞争普遍化的条件才会产生的。不断忙碌奔波，就会形成“空心病”，奋斗丧失目标、人生失去意义、价值失去归宿。

2. **自然科学服从于工业。**所以在马克思看来，机器大工业、工业革命、工业资本的诞生彻底改变人类的科技状态。科技无罪，有罪的是其社会应用。马克思认为，创新本身并没有原罪，但问题出现在这种创新的社会应用——整个科技创新的社会逻辑发生了改变。以前的创新，是自发性的创新，依赖于科学家个人的发现、探索，其经典的形象就是“苹果砸在了牛顿的头上，瓦特盯着蒸汽机看”。然而，工业革命之后，自然科学开始服从于工业，科技创新的内在逻辑改变了。表面上还是靠科学家的推动，但科学家不是处于个人的意愿和兴趣，而是出于资本逻辑和社会需求。不创新意味着死，所以公司成立研发部门，创新从个体行为变成社会行为，从自发行为变成强制需求，科技创新的逻辑便改变了。

3. **抽象统治一切。**商业流动的自由化、个人的独立化、个体的觉醒。个人获得独立地位，所以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人权、平等、民主出现。个体觉醒，不再像行会一样依托宗法关系，个人获得解放，但也同时沦为孤独的个体——原子化的个人。个人虽然独立，但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越来越抽象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抽象统治一切。过去的劳动你很清楚其流程，但现在你只知道其一个步骤、扮演一个器官；过去人与人的社会联系是具体的，而现在金钱关系契约关系这种抽象联系代替温情脉脉的具体联系，也就是梅因所说的“身份”和“契约”的区别。个体流动化，就是社会扁平化，就是社会联系的抽象化。参考**李猛《论抽象社会》**。抽象意味着感性的死亡、自然的消失。大自然不是消失了，而是对自己不再有感性的意义。手工业中的“手”之自然、行会中的师徒感情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抽象的东西，人们不再关心感性的具体的使用价值，而是关心抽象价值，关心“能卖多少钱”而非“东西有什么用”。[[21]](#footnote-21)

4. **世界历史/普遍性的出场。**抽象的目的，是为了可以普遍化，让资本的力量、商品的交易充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普遍化就带来竞争关系普遍化，竞争关系普遍化就敲响传统社会的丧钟。在竞争关系没有普遍化之前，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你尽管去岁月静好；但一旦英国殖民者以“站在门口的野蛮人”的形象出现在国门，中国这样的国家就像（马克思所说）木乃伊进入阳光空气中一样迅速解体。所有民族卷入商品经济，传统手工业瓦解，传统社会关系激烈变革，取而代之以大工业的资本关系。因此，世界历史、普遍性出场。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进步是一种强制”。不进步等于死。无论科技创新、社会关系、政治发展，还是商品贸易都来源于此，来源于资本增值的本性和冲动。

通过以上这些分析，就可以明白，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是需要历史过程作为条件的。然而，封建社会的解体是随着市场开辟、竞争关系的普遍化，意味着封建社会的关系不是依靠自身内部因素解体，而是依靠外部的因素被动形成（除了英国），通过“站在门口的野蛮人”。然而，进入世界历史、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整个世界是平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何以可能？这时候就没有任何一个站在门口的野蛮人。资本主义不再是门口的野蛮人来敲响它死亡的丧钟，而是由它自己培养出的掘墓人。同样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决定”，内涵完全不同。为何如此？下回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期9 马克思对社会存在的把握2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6 2019.11.13**

**分工**

**交换🡪商品经济、世界市场**

**世界历史**

生产力在何种意义上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不是一个抽象的决定，不能停留在外部反思即黑格尔所说的空疏理智的抽象知性把握。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是一个**历史过程**。《形态》中，从等级资本到商人资本到现代工业资本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个历史过程。手工业（行会）生产，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生产力演变发展过程中，随之而来的是商品交换的发展、劳动分工的提升、世界市场的形成。其中有许多中介环节。经过这样一些尤其是**分工**和**交换**的中间环节，生产力才作用于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变革才引发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包括生产关系从而也对生产力有反作用。通过这样一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用的论述实际上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过程展示清楚了。交换慢慢发展，就成为**商品经济**、**世界市场**。各个民族卷入到竞争。

由此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版本的**世界历史**。《形态》：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个命题并不是马克思所提出的，在马克思之前，维柯、但丁都已经讨论过世界历史。黑格尔历史哲学中也专门讨论了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就是说，各个民族地区的发展日益呈现出世界性，而不再局限在民族国家的内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全球化[[22]](#footnote-22)**。

因此，世界历史讨论的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人类形成了一种超越国家的新秩序、新整体。在这个意义上，这个世界历史的概念，马克思并不是其独创者，维柯、黑格尔都讨论过。维柯讨论的是理性的世界史，黑格尔也类似，是以其绝对精神的展开来讨论。最不成熟的世界的童年在中国，成熟在西方。然而，马克思则是从**现代生产**的角度来把握世界历史。马克思特别强调，当我们从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世界市场/世界历史/世界相互联系的作用在社会形态转变过程中不容忽视。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分析框架，对唯物史观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讨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辨证作用，是以之为线索讨论人类社会的形态转变。**“五形态理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然而，这个“五形态理论”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从历史上来看，我们会发现，中国就没有经过这样一个严格的五形态，其中最值得怀疑的就是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和西欧的封建社会完全就是两回事情[[23]](#footnote-23)。那么，这种社会形态的演变是否还具有普遍性？

**社会形态**

**五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三形态：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自由人联合体**

**两形态：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史前史，和真正的人类史**

实际上，在马克思处，他认为，社会形态不是只有五形态这样一种单一的划分方式。在《1857~1858手稿》中还有**三形态**，在《资本论》还有**两形态**理论。

三形态理论：人的社会划分为三种形态即：

1. **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滕尼斯所讲的共同体，或者说熟人社会）

2.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它的进步意义在于出现了人的独立性，即人从直接的互相依赖关系、业缘血缘地缘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个体，成为现代所有价值观的轴心——平等是以个体为单位的平等，自由是个体的意志和权利，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基于人的独立性产生的。然而，人的独立性不是没有条件的：它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有商品的交换、分工的强制（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人可以自己自由分工，上午打猎下午钓鱼晚上从事批判），等等。人还不是真正自由独立的。

3. **自由人联合体**。摆脱物的依赖性，从人的个体性出发，实现人的主体性。

两形态理论：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史前史，和真正的人类史。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类史，只有在其中人才能叫做人。而之前，人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主体，所以都是史前史，即五形态中的前4，三形态中的前2都是“史前史”。

两形态和三形态理论是可以合并的，而和五形态相比，区别在于**划分标准**不同。五形态的划分标准就是**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三形态是以**人的存在方式**为划分标准。但实际上这样一些划分的实质性区别并不大：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各阶段就是人的依赖性社会。三形态相对五形态的优点，是可以更加容易普遍化。例如，中国在五形态当中，其实是只有资本主义萌芽，没有资本主义完整的阶段。讲中特是“补资本主义的课”。然而，三形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为其划分标准非常抽象，这样我们今天就可以被划分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

问题在于，五形态理论到底怎么去理解？这个五形态理论是否构成历史规律？实际上，借助世界历史的视角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特别好解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里面所讲的历史规律之为规律，一定要以世界历史的普遍展开为前提，即只有当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候，人类社会的规律性才可以呈现出来。原始社会当然是各种形态的，否则人类学就要消失；奴隶社会当然是各种形态的，否则考古学就要消失；封建社会当然是各种形态的，否则古代史就要消失。实际上，真正具有历史普遍性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它具有全球化的扩张性。在此之前，人有各自演进的路线，并没有按照五形态理论严格来走。〈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诸形式〉，就是说前资本主义时代不同地区生产组织的方式，是有其差异性的。资本主义是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性的，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展开前各个地方是分散的，发展的道路相对来说是独立的，有各自演进的方式，因此谈不上规律。规律必须建立在普遍化的基础上，只有人类的交往到达了世界历史的广度和深度的时候，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才呈现出来，我们才突然发现，生产力对人类历史的推动作用。这就体现在资本主义市场的开拓当中、世界历史的展开过程中不竞争就是死。

唯物史观、历史规律、五形态的普遍性，都必须在世界历史的交往中才能体现出规律。在此之前，只能充其量称为“道路”，而没有普遍化。马克思本人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也是如此：他首先看到的是英国、法国、德国三个国家的时代差距，在这个过程中他慢慢发现原来是工业、生产力，而不是政治、哲学在决定时代发展的方向。马克思也是在世界交往、国家比较的横向联系中才发现世界历史演进的纵向关系。因此，只有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之上，我们才能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同样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决定的展开过程，在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和在资本主义社会转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并不是一回事。这两种社会形态的转变过程完全不同——从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靠的是原发（内生先发）国家（如英国）的工业革命、技术创新、工业生产力进步。其物的依赖性和人的独立性都是内在的。但是，对于更多国家，都是外生的，比如中国：没有鸦片战争中国社会形态就没有内部的激烈变革。对于中国而言，社会的激烈因素不是内在的培育，而是外在冲击形成的。中国社会形态的转变是因为“门口站着的野蛮人”。然而，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马克思讲得很清楚，不是靠“站在门口的野蛮人”，而是“自身培养的掘墓人”——很难从外部推动，而只能靠内在矛盾来进行社会形态的变革。为何会发生这样一个转变？原因也在于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扩展之后，资本笼罩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展开，没有一块地方外在于资本。如果有一块地方外在于资本主义，那么它就是没有价值的。资本主义由于其世界历史性覆盖全球，因此社会形态变革只能依靠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展开，不是外部冲击而是自身演化。这就是二者完全不同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之内在逻辑[[24]](#footnote-24)。

现在问题来了：资本主义通过自身培养掘墓人的方式来完成社会形态的变革，这何以可能？

资产阶级培养自己的掘墓人，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这个结论的重要性在于，当我们讨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不能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看成两种实体，把变革看成小孩换衣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在是统一的。

那么，《共产党宣言》如何讲掘墓人的问题？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内容，就是**资产者和无产者**。他首先讲，“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实际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就是从阶级斗争的线索来谈的。这个线索从一开头就埋藏一个巨大的问题。

暂且先不管这个线索，看马克思怎么描述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及其产生的深刻改变。这个改变，就如同《形态》里面所讲的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现代性图景是差不多的。然后马克思开始分析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这句话意味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如影随形、一体两面。矛盾两方面互相依存，彼此都是同时存在的。

马克思在《宣言》中讲的掘墓人是什么意思呢？——无产阶级不是别人所造成的，而是资产阶级自己所培养出的掘墓人。因此，无产阶级不是外在于资产阶级的，而就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运演的。

**隐蔽的国内战争**

**根源：阶级简化 绝对贫困化**

**客观：机器大工业🡪联合**

**主观：“教养”**

这里马克思用了一个概念：**隐蔽的国内战争**。马克思认为，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就是国家的内战状态。回想《雾月十八日》：小波拿巴的下台很大程度上直接原因是普法战争的失败。波拿巴的对外扩张走投无路，必然会引发作为其统治基础的小农的战争。《法兰西内战》：普法两个国家的战争，马克思却称为“法兰西内战”。普法战争在马克思看来就是无产者反对资产者的一个内战状态。

在隐蔽的国内战争中，马克思说，其**根源**就是**阶级的简化**。社会必然因为机器大工业而导致两个阶级的决裂和对立。其他的阶级都会被归入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中，成为二者之一。这是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存在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这是隐蔽的国内战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根源。

马克思说，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工资几乎到处降到同样多的水平，无产阶级内部的生活状况越发一致，资产阶级的竞争和商业冲击使得工人工资越发不稳定……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发具有两个阶级之间冲突的性质。……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

马克思说，这样一场隐蔽的国内战争中，资产阶级之所以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有2个因素：

1. **客观条件**：机器化大工业时代在生产方式上消灭了小生产的分散性，越发具有组织化的程度。因此，其在客观上使得工人可以在机器大工业的基础上实现联合。这是无产阶级形成总体性阶级力量的重要客观基础。《宣言》的整个中心思想，就是其最后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中浓缩了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1) **全世界**。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是具有世界历史性的生产方式，不再局限一个国家，而必然推广到整个世界，引发世界范围的变革。因此，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也必须建立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前提是资本主义，已经是世界历史性的了，所以共产主义也应当是世界历史性的。这个结论的政治含义，就是当时法国、英国、德国的无产阶级应当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即**共产国际**。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很大程度上是在教育各个国家的工人：“工人没有祖国”——今天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其社会历史性。各国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形成共产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因为他们都有同一个名字，叫无产者。(2) **无产者**也是机器化大工业的产物。无产者的前提，是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分离、劳动者对劳动资料的丧失，劳动者自由到一无所有，以致于只能卖自己的劳动力商品。这样一种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彻底分离只有机器大工业才能实现。工场手工业（蒲鲁东、魏特林主义的基础）中劳动者还部分占有劳动资料。这里的政治寓意，就是批评蒲鲁东、魏特林、社会主义内部的其他派别。只有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才是有可能的。(3) **联合**。联合的原因也是机器大工业。工人的纪律是在机器大工业条件、分工高度细化、工厂的“全景敞视主义”（福柯）监视中发展出来的。无产阶级之所以组织化，其联合的客观基础就是机器化的大工业。从客观上面来说，无产阶级的联合，其根源在于机器化大工业，就是资产阶级所推行生产方式的效果。

2. **主观条件：**无产阶级的斗争艺术越发炉火纯青。用马克思的话，就是**教养**——主体意识、斗争能力、斗争水平。无产阶级的革命素养，马克思说，就是被资产阶级训练出来的。

(1) 资产阶级在反对地主阶级、反对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过程中往往要寻求同盟军、无产阶级的帮助。因此它不可避免要借助无产阶级的力量，无产阶级也在这个过程中提升自己的教养。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旧社会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处在不断斗争中，最初反对贵族，后来反对……在这一切斗争中，它都不得不呼吁无产阶级，要求无产阶级的援助，把无产阶级卷入政治运动，因此资产阶级就把自己的教育，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了无产阶级。

(2) 工业的进步把资产阶级处于下风者驱赶到无产阶级当中，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批教养因素。这和阶级的简化是一脉相承的。资产阶级有很多人会被迫进入无产阶级队伍，这就是无产阶级教养的第二个来源。

(3) 接近阶级决战的时刻，统治阶级内部的瓦解过程达到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者的一小部分人脱离了统治阶级……正向过去部分贵族转到资产阶级一样，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也……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和(2)的被动转入无产阶级相比（“卿本佳人，奈何做贼”，沦落风尘，参考《水浒传》），更重要的是(3)：接近阶级决战的时刻，部分资产阶级主动加入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未来之光。马克思、恩格斯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共产主义运动中很多的领袖，很少是穷人。中国革命也是如此，毛泽东出身富农，周恩来出身没落官僚（好歹有点底子），但这些人“自觉站到了无产阶级方面”，因为他们能够在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些人也给无产阶级提升了斗争水平和斗争艺术[[25]](#footnote-25)。

资产阶级主观上赋予了无产阶级以教养——斗争艺术和斗争水平；客观上生产方式的机器大工业促进了无产阶级的联合。因此才会出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决裂。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培养自己的掘墓人”。

马克思说，工人之间也会分裂，也会有相互竞争，因为工人就是劳动力商品，只要是商品就会有商品之间的竞争，比谁更贱——只有我更贱我才能获得饭碗。今天美国工人对中国工人的仇恨就是这样。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分裂。然而，马克思说得很明确：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也是暂时的，他们真正的成果是工人扩大的联合。也就是说，工人起义的成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人在这种斗争中扩大联合，而且这种联合终将会取代相互竞争和工资差异带来的分裂。这种联合也是机器化大工业的结果。马克思说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靠几百年才实现的联合，现在的无产阶级只要通过铁路几年就实现了。

以上是《共产党宣言》中对于**隐蔽的国内战争、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工人的联合**的基本理解。这个理解存在很大的问题：没有实现。今天我们没有看到工人的联合，反而资本家在联合，工人彼此分裂。第二国际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各个国家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没有实现跨国联合，没有实现马克思所讲的阶级跨国联合。今天美国工人对中国工人的仇恨，也是一点都不讲阶级感情（笑）。因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劳动和资本的流动性是不均衡的——资本可以到处流动，但劳动力商品却不能到处流动。河南的工人只能在河南富士康打工，没法瞬间流动到纽约、底特律、鲁尔区。劳动者被牢牢限制在土地上、国家内部，资本却可以流动。资本和劳动流动性的非对称性，使得无产阶级在今天的联合变得有点遥不可及、虚无缥缈。

更重要的是，这种绝对的贫困化在今天也没有看到，反倒无产阶级越发沦为工人贵族，变成中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也分享“一个家庭一辆车”的美国梦。因此，马克思这样的阶级斗争图景沦为虚幻。

马克思的确说无产者和资产者是一体的，不是外在嫁接的，但他说“至今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其实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待问题，把阶级斗争的根源确立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上——这个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图景是定位在**工业资本主义**的阶段。马克思对于客观条件、主观条件的所有这些论述都是工业逻辑出发的。因此，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成，例如，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那么内部的逻辑就自然会改变，两极分化、贫困化、联合化也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宣言》写作的背景，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完成了资本主义。《共产党宣言》是早产的，其革命斗争图景和方案最后都没有实现。1848年《宣言》写就，发生1848年革命，阶级斗争没有到来；1857年英国金融危机，革命还是没有到来。因此，马克思在这个时候就写下了“两个绝不会”。

《共产党宣言》两个必然：资本主义必然消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

《1857~1858政经批判序言》两个绝不会：旧社会的生产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的时候新的生产关系绝不会消亡，新的生产力没有完全发展的时候新的生产关系绝不会出现。

因此，马克思不再寄希望于简单的这种阶级斗争模式了，而是开始写作《资本论》，希望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得出的重要结论是，资本会使自己走向灭亡，资本会自己限制自己。《资本论》和《宣言》的区别，是前者更多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而非像后者一样借助阶级斗争来展开革命。

资本的逻辑，必然会贯穿在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使得全社会服从它。对于这样一种资本的把握，两个维度非常重要：

**资本**

**1. 物质载体—生产力**

**2. 社会关系—生产关系**

1. 第一个维度：资本有其**物质载体**。例如，货币就是资本的物质载体。这实际上是**生产力的维度**，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讲资本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形式，因此它才能在短短一个世纪不到的时间取得比之前所有都要丰富的成就——这是“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是资本的进步性的体现。

2. 更重要的是**社会关系**的维度，它被马克思认为是资本逻辑的本质。马克思强调，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关系。这个层面就使得资本不可避免地走向自身的瓦解。

**期中作业**

写3000字左右，最多不超过5000字（不能超字数，字数越多得分越低）。

论题：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关系”。

论证：结合文本，从以下三个文本中任选其中一个文本根据其内在思路证明资本为何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关系。

1. 〈雇佣劳动与资本〉；

2. 〈资本主义生产前的诸形式〉；

3. 《资本论》第一卷第25章〈现代殖民理论〉。

**DDL：11月底。**

1. 这种二律背反，后来就被马歇尔边际革命给抛弃了——现代经济学认为，亚当·斯密蠢就蠢在劳动价值论，不应该讨论价值这一哲学概念，而应该讨论可以量化的价格（数量关系）。马歇尔的现代经济学是数理经济学，关心的是价格机制、价格如何引导市场供求均衡。就用边际效应代替了劳动价值论。 [↑](#footnote-ref-1)
2. 按劳动价值论，工人创造的所有价值财富应该在工人中得到分配（这是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的结论），但是工人生产越多越贫困。 [↑](#footnote-ref-2)
3. 这已经进入日常生活/学术界，例如许多哲学学者喜欢对海德格尔妄加非议，海德格尔和纳粹勾结，所以他的学术不伟大。包括马克思，据说他和女秘书女保姆有各种私生活混乱，所以这个哲学家很糟糕。我们经常会有这种见解，但它完全是反哲学的见解。你如果和海德格尔一样搞纳粹，和马克思一样搞婚外情，那能说你的思想和海德格尔达到了同样的深度吗？ [↑](#footnote-ref-3)
4. 上班拿钱，旷工扣钱。资本家提供资本，他们理所应当获得利润，因为这一切都是等价交换。 [↑](#footnote-ref-4)
5. 就业就是出去卖，卖你们的劳动能力。（众笑）谁愿意卖啊？（众大笑）这是被迫的行为。你没有一个好爸爸让你去创业，你只能卖。有的人说，我没有好爸爸，我有idea，我有创意——这些都属于劳动力，你还是要卖，卖给资本家，什么天使轮投资什么的。 [↑](#footnote-ref-5)
6. 你光看到了张老师胖，你没看到张老师的智慧，凭什么张老师的智慧更本质？ [↑](#footnote-ref-6)
7. 这段张老师课上逻辑没理清楚，举了一些例子。 [↑](#footnote-ref-7)
8. “共享改革成果，共享改革红利”。 [↑](#footnote-ref-8)
9. 马克思是圣人，卢卡奇是亚圣。 [↑](#footnote-ref-9)
10. 北京：灰头土脸的都是新教堂，金碧辉煌都是天主教堂。 [↑](#footnote-ref-10)
11. 例如，自己的铅笔钝了，削尖铅笔，在李嘉图看来不算劳动。但汤普逊会认为这是劳动。 [↑](#footnote-ref-11)
12. 中文看不太出来。蒲鲁东是philosophy on poverty，是对贫困的研究；马克思则是说poverty on philosophy，是说蒲鲁东哲学素养不好。 [↑](#footnote-ref-12)
13. 中国的情况：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城市）和集体（农村）。我们的土地没有私有化，**在这一点上**中国最顽强地保留了社会主义（众笑）。中国倾向于卢梭的观点。 [↑](#footnote-ref-13)
14. 说是“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者性格上的原因”，可以这么说，虽然也不尽然。马克思是金牛座，注重现实利益，比较固执。 [↑](#footnote-ref-14)
15. （众笑）你们怎么听到冷淡这两个字这么高兴。 [↑](#footnote-ref-15)
16. 蒲鲁东也有很多自创概念。蒲鲁东也是精读黑格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者著作，三者综合，这点和马克思是一致的。 [↑](#footnote-ref-16)
17. 小生产者的状态有一个典型的形象：作坊（工场）。生产皮鞋的作坊，做一双皮鞋从牛皮到成品都是我和我的徒弟、工友一起做的，我还是小老板，拥有皮革、工具，拥有所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大机器生产中，工人只是一个零件，不了解皮鞋的全貌，工人对于皮鞋、工厂机器设备等一切生产资料都没有所有权。 [↑](#footnote-ref-17)
18. 保留一个人的优点、改正一个人的缺点，是违反辩证法的。因为按照辩证法，人没有优点没有缺点只有特点，特点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优点，在一定条件下成为特点。 [↑](#footnote-ref-18)
19. 我们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理解很大程度上都在知性层面上理解，理解成小孩长身体换衣服，这是不对的，是一种知性理解。甚至有一个更荒谬的例子用马克思解读婚姻关系：两个人的财富、颜值、三观是生产力，父母包办或者自由结合是生产关系，双方自由结合之后生产力不断变化，一方三观不断提升颜值不断保留灵魂不断向上财富不断积累，另一方一直处于落后状态，从而产生一个新的生产关系，叫小三。比如老公回来老婆骂老公，就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庸俗化到这种程度（众笑），这骇人听闻。 [↑](#footnote-ref-19)
20. 过去梨园行要投师要写“关书”。关书彻底买断孩子的人身自由，生死逃亡一概不论。这就是一个体现。 [↑](#footnote-ref-20)
21. 一个最简单的比方，用交通工具来理解传统、感性、具体。飞机与高铁速度极快，蓝天白云是抽象的，高铁上的景观是模糊的印象派会话。公交车上你能感受到感性，但在地铁上你就只能感受到抽象，感受无穷无尽的黑暗。 [↑](#footnote-ref-21)
22. 全球化和国际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国际化的前提是必须承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民族国家基本秩序，以民族国家的存在为前提，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讨论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问题。然而，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是超越民族国家的一个基本理念前提和基本视角的。举例而言，今天全球化很大的一部分动力来自资本流动，而资本是没有国家性的，不问国家的。所谓的全球化是超越国际化的（以国家为前提的）状态，准确而言，全球化并不需要国家，而是通过地区在某种程度上连结成一种新的、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秩序，从而呈现出一定的全球性、世界性。

    要理解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区别，才能理解今天的全球化逻辑。今天的国际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和国际化的矛盾造成的。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资本的逻辑是全球性的。对“人类命运的共同体”这个概念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地缘政治的解读，似乎是认为这是一个超越现在单极的国际秩序。而对于哲学的解读，它强调的则是共同体的连接纽带——**命运**。所谓命运问题，马哲有其自己的思考——对于马哲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的学者认为是一个高远的理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有的学者认为是介于自由人联合体和全球化资本主义现状之间的过渡状态，但这些说法都并不太成立。实际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以命运为纽带，即共同应对全球风险的共同体。命运是共同的生存处境，除了经济联系、政治分裂、文化差异、社会冲突之外，就是一个公共性、全球性的生存风险。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一个风险的共同体，全球的国家和人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气候、生态环境等问题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超越了地区或者国际社会的界限，成为全球公共问题。基于这样的风险，才可以说是命运共同体的。

    然而，今天全球化的麻烦之处在于以国际的思路来应对全球风险。例如，《巴黎协定》意图解决全球性的气候问题，但采用了国际社会的协商手段，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因此《巴黎协定》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落实。国际化好比战国时代，全球化好比大同时代，用战国手段来建立大同理想是不可取的。

    历史学界的新潮流：**全球史**。基于国际化的历史叙述是**世界史**，这一世界史在中国即和中国史相对应，讲的是“别国史”。**全球史**的单位则是全球，不再拘泥民族国家/国际体系的视角来构建历史叙述。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讨论，例如“文明之间的交融碰撞”、“希腊文明中断之后如何依靠其他文明实现Renaissance”、“欧洲的转型如何借助世界性的其他因素完成”、“欧洲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发轫和黑死病的关系”等流动性、全球性因素的讨论。这里就体现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区别。“世界历史”也是定位在全球化的层面。 [↑](#footnote-ref-22)
23. 如果我们反过来用中国历史来套西欧，那么西欧这段封建社会相当于先秦（周代分封建国，战国春秋，诸国林立，邦国交战）。秦汉从分封制转向郡县制，建立强大稳固的中央集权帝国体系。福山讨论政治秩序的起源，说中国是第一个进入现代国家的——最早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体系。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的过程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如果要评价我，我就是马克思+秦始皇。”他是马克思这点很好理解，阶级斗争、社会平等；然而，他是秦始皇，原因非常简单，因为秦始皇坚持郡县制。毛泽东在文革给郭沫若写诗“劝君少骂秦始皇，莫学子厚返文王。”不要从柳宗元《封建论》倒退到文王的分封制。中国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转变，对应过去，就是西方摆脱封建社会之后进入的绝对主义王权国家时期。这个对于西方社会非常短，但对于中国非常漫长。中国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转变过程是非常深刻的：先秦诸子百家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么多家，都是一家，都是追求天下太平摆脱政治混乱状态，只不过方案不同。孔子的方案是“吾从周”，恢复周礼，正名，君臣父子；老子则说，因为有了名分，就有了差异，差异使得每个人都无法安于现状，恰恰造成了社会的矛盾。老子的方案，则是把“名”背后体现出来的欲望消灭掉。老子政治哲学的“无为而治”（很多人他妈都胡说八道，你这种屌丝连有为的资格都没有还谈什么无为）就是消灭君主侯王心中的欲望。这个比儒家更加不靠谱：儒家是规范欲望，老子是消灭欲望。老子有他很深刻的地方，从老子这一脉发展出法家，法家是郡县制的推动者，他们不是规范欲望也不是消灭欲望，而是利用君主的欲望实现天下统一。然而，用施特劳斯的讲法，法家的都是显白教诲，老子是隐微教诲（众笑）。所以历史上所有的法家没有一个是好下场的。法家和皇帝说“你要控制你的臣子，你就要基于臣子的恐惧”，这个和霍布斯《利维坦》所说的差不多。怎么恐惧呢，就是要神秘莫测、信息不对称，让臣子对你的想法都不了解，而你了解臣子的全部想法。皇帝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建立巩固的统治。皇帝上殿以后，发现，所有人都不了解他的想法，只有一个人，就是教会他这些帝王之术的人对他的想法了如指掌，所以就干掉了法家。法家在霸道的路上一条道走到黑，于是出现商鞅。商鞅推行法家路线，严刑峻法，不是说“确立法治尊严权威”，而是**连坐**（毛主席：把犯罪分子消灭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朝阳大妈随时有一双眼睛关注你），**严刑峻法，轻罪重判**，犯了法就只能流亡（没有GPS定位），商鞅甚至消灭全部旅馆，取消旅游业，要住旅馆必须开公家介绍信，私自旅游要处以极刑。商鞅法制推行一个月秦国老百姓就生活不下去了，一个月以后就上访说商鞅变法让人不流动以从事农业生产。商鞅最痛恨的就是商人，他对商人禁止从事粮食和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买卖（即不能干最赚钱的事情，只能卖卖奢侈品）、课以重税、商人的雇佣工人全部要被登记在册，以随时待命被国家抽走做建设工程。商鞅就是要让所有人耕战强国。如果你是一个农民，你在商鞅的时代就进入了美丽新世界（笑），谁抢你家地和牛，杀；谁不让你从事农业生产，杀。商鞅这是一个暴政。然而，毛泽东在文革时候为何对法家这种暴政特别欣赏，甚至发起一场儒法斗争？——因为商鞅完成了一种**军功授爵**的平等，上战场杀人，完成阶级流动。这在毛泽东看来是最重要的平等。毛泽东反感儒家，因为儒家讲亲亲尊尊，某种程度上看重出身、家世、门阀，极为不平等。商鞅军功授爵之后，在秦国就有一些人非常不满：既得利益集团，老秦贵族。贵族是因为“有一个好爸爸”而成为贵族，但现在他们也得上战场打工，所以他们就不干了。不干了之后，商鞅就采取郡县制的方法对秦国利益集团予以彻底打击。郡县制非常简单，就是说，原来分封制的封地不动，但是这块地方由中央派来的大臣监管，对你来说你只能将其作为**食邑**，收取其上的出产。这对秦国的封建贵族产生严重打击。秦国变成了一个帝国。贵族就不满商鞅。商鞅死在他自己的理论上：军功授爵最大的功劳在商鞅，商鞅的功劳已经没有匹配的东西赏赐了，就只能让他死。他死于自己的天罗地网。商君死于商君法，商君法却被反过来。

    汉代仍然有郡县制和封建制之争。山东六国本来都是封建制，被迫接受郡县制，时刻想着分封制复辟。因此，反对秦王的除了刘邦之外都是六国贵族的后人，就是想复辟分封制。后来刘邦得天下，没办法，也能先搞分封制，然后干掉异姓王。同姓王七国之乱，汉景帝干掉了。然后到汉武帝。司马迁的《史记》不是历史书，而是我们中国最早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众笑）《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但和其他二十三史有本质区别：其他都是后人修前朝史，唯独《史记》是本朝人写本朝史。某种程度上，司马迁的《史记》写了《今上本纪》（虽然今天抽掉了）。《史记》的笔法，是把一个人的传记写得非常好，然后把他做过的坏事全部放在别人的传记里面。司马迁写的汉武帝时期的列传，开端是《魏齐武安侯列传》，然后所讲的是汉武帝如何一步步把皇帝的绝对军权发挥到极致。列传里的丞相从前到后一个比一个猥琐无能。此外，要打击游侠、豪强。然后靠酷吏、儒林（特别猥琐的文人，不是今天说的儒家，是今天的御用文人）来统治。司马迁要讲的，就是汉王的个人权力如何登峰造极。《史记》，就是要代表历史来让后人审判汉武帝。史官在史记中是天官。司马迁在汉武帝时代意识到了天下为私的集权的弊端，所以在《史记》中提倡**天下为公**的理念。《史记》三种人物传记体裁的开头都很有意思：皇帝叫本纪，第一篇是五帝本纪，讲禅让制；诸侯叫世家，第一个世家是吴世家，因为吴太国让国，自己跑到南方去；列传第一篇叫伯夷列传，因为伯夷叔齐谦让王位。《史记》每个体裁的开端都是“让”的线索，都体现天下为公。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忍辱负重就是这样。《史记》形成了史官制度，发扬《春秋》精神，对后世绝对君权起到制约作用。 [↑](#footnote-ref-23)
24. 我的问题：按照这种“世界历史”维度的解读，那么列宁主义的“可以率先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不就完全是瞎搞了？ [↑](#footnote-ref-24)
25. 中国的农民起义，成功的案例基本上是农民和没落文人的结合。中共是如此；《水浒传》宋江吴用两个没落文人领着李逵这样的农民，加上林冲之类统治阶级内部的力量。 [↑](#footnote-ref-25)